

前 言

最近一个时期，北京市城乡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，编写出一大批家史、村史、社史、厂史以及各种专题史。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到，解放前北京地区广大劳动人民，一方面在封建主义、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，饱受残酷的剥削和痛苦的煎熬，有着辛酸苦难的经历；另一方面，他们也从未屈服过，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，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斗争历史。这些史料，对于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，有着很大的教育作用。

青年一代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，任重道远。青年人只有真正了解老一辈人的苦难经历，经常回忆对比，忆苦思甜，才能不忘过去，永不忘本；才能热爱今天，创建将来。只有真正了解老一辈人光荣的革命传统，才能继承并发扬这种传统，继续艰苦奋斗，肩负起接班人创立共产主义大业的重担。而要达到这个目的，一个十分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，就是充分利用家史、村史、社史和厂史等这些活教材，经常不断地对青年一代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。编写家史、村史、社史和厂史是思想教育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。

基于这种認識，我們特从本市家史、村史、社史和厂史中选出一部分，編成《北京四史丛书》，陸續出版，作为北京市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材料。由于編写者水平所限，加上这项工作在目前还是个新课题，这套丛书缺点与錯誤一定难免。我們热烈地期望广大讀者能把讀后意見告訴我們，以便今后把这套丛书編得好些再好些。

編 者

目 录

- 我家的血淚史..... 机車車間鋸工 葛文遠(1)
- 憶父話家史..... 招待所工人 吳艳榮(11)
- 牢記階級仇, 不忘斗爭路
..... “二七”退休老工人 孫茂林(21)
- 斗爭的一生..... 退休老工人 郭景福(39)
- 走出地獄上天堂
..... 全国劳动模范、工程师 陳 发(54)
- 苦海深仇..... 貨車車間木工、生产組長 杜光普(69)
- 苦難三十年..... 鑄工車間煉鋼工、生产組長 卢增海(83)
- 父仇子恨..... 鑄工車間翻砂工 李茂林(97)
- 悲慘的遭遇..... “二七”退休老工人 馮 祥(113)
- 后 記..... (121)

我家的血淚史

機車車間鑄工 葛文遠

殺父之仇

我的老家在山东德平县。父亲名叫葛树贵，他十七岁那年，家乡闹灾荒，穷人没了活路，就用小車推着瞎了眼的奶奶，来到了长辛店。当时我有一个舅爷在大厂做工，父亲投奔他以后，算安了家。舅爷又帮助父亲进了厂，当了小工。

“二七”罢工时，父亲是糾察队副大队长，当时人們都称他“大老葛”。父亲腰里常插着月牙板斧，領着糾察队站崗、截車，沒黑天沒白天地奔跑，凡是大伙的事从来沒有过二話。

他不怕工头，不怕总管，連拿大枪的反动軍队都不放在眼里。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那天，在火神庙与反动軍警对陣中，他領头向前扑去，身上中了好几枪，还大喊：“伙友們！夺他們的枪啊！”伙友們把他救下来，抬到哪里都沒人敢治，因为伪鉄路局长赵繼賢早就下了命令，不准給罢工的工人治伤。当天夜里，父亲就壯烈牺牲了。当时我人小剛記事，記住的头一件事，就是这个大仇大恨。

家破人亡

父亲一死，丢下我們四个孩子（奶奶由叔叔送回了老家），媽媽給人家縫洗衣服，我和姐姐去拣煤核、挖野菜，靠着地下党和叔叔、大爷們的帮助，过了一陣子。家里交不起房租，房东就拿我們的東西折价，他說算几个錢，就算几个錢。穷人家能有多少家具？很快屋里就空了。不久，房东就把我們撵了出来，媽見实在呆不下去，只好領着我們上了西边的小屯村，投奔了姥姥家。姥姥家房无一間、地无一壠，舅舅給地主扛长活。他把我們安頓在地主家場边的一个小窩棚里。我們想給地主摘豆莢、拿菜虫，混口飯吃。沒想那天，地主带着几个狗腿子走来，气势汹汹地冲我媽說：“这不是你們呆的地方。”接着把文明棍一揚：“全給我滾！”

我媽是个有志气的人，二話沒說，抱起孩子就走了。上哪儿呢？长辛店不敢去，如果讓官面上知道是罢工的工人家屬，說不定会出事。因此，媽才領着我們上了盧沟桥，找了个大門洞，才算安了家。媽和姐姐給人家洗衣服，我和弟弟挖野菜，有时去杜家坎那儿帮人推洋車。那儿有一个大沙滩，我們帮着把車推过去以后，求坐車的給个小錢儿，可是誰給呀！尽管我們想尽办法掙口飯吃，到头来还是免不了餓肚子，沒法子，只好討飯。

附近有个姓刘的，老两口摆小摊，媽跟姐姐平时待他們很亲热。我們常帮助搬弄些东西，看看摊儿什么的，換几嘴吃的。老两口沒儿沒女，跟我媽商量就把姐姐过繼給他們

了。

一天，媽媽掙來了一碗多米，那是真正的小米，全家都很高興，媽說：“孩子呀，你們哥兒倆去弄點野菜來，咱們吃兩碗小米粥吧。”我們答應着，好像過節似的歡喜，很快弄來了野菜，晚上就做了一鍋粥。這工夫，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一大群兵。這幫土匪簡直跟餓狼一樣，見我們這鍋粥熟了，不容分說，把我媽和弟弟推到一邊，眨眼工夫就吃了個淨光。那天我要飯回去時，媽和弟弟哭得跟淚人一樣。後來媽說：“哭也沒用，你們長大以後，要長個志氣，你們爸爸就是被京漢鐵路的局長趙繼賢和軍閥吳佩孚的大兵打死的……”接着，她就給我們講起了“二七”大罷工的事。這事她講過好幾遍，每次講後都一再囑咐：“長大以後，一定要給你們爸爸報仇哇！”

不幾天媽就病倒了。我們見她老不吃東西，以為是嚙不下野菜，就想辦法要來了窩窩頭、餅子什麼的，我們餓了一天，沒捨得吃，拿了一塊送到她嘴邊說：“媽，吃塊饅饅吧。”她把我的手推開，搖搖頭。我說：“您吃吧，還有那。”我們一邊哭、一邊拿要來的東西給她看。媽睜開了眼皮，大顆大顆的眼淚流下來，她用很弱的聲音說：“孩子，媽吃不下去了……不能再跟你們過了……你們要記住，給你們爸爸報仇哇！……”第二天早晨，媽就斷了氣。

牛馬生活

媽媽死時，正趕上叔叔來盧溝橋，他那時在良鄉兵營里

当馬夫，是个好吃懶做的人。他領着我給街坊四邻磕头，有錢人只是摇头，沒一个理的。好容易湊了几个錢，买了几块木板，釘了个匣子，好歹把母亲埋了。

第二天，叔叔把我們哥儿三个带到了良乡，說是給我們找个活命的地方，可是一連問了好多家，也沒有人要。最后走到离車站不远的王家，留下了老二；到梅花庄的馬家留下了老三；剩下我再也沒人要了。叔叔就帶我上了丰台，挨着店舖打听也沒一家要我的。为什么沒人要我呢？我看了看自己，难怪呀，瘦得只剩了一把骨头，由于討了三年飯，常睡湿地，生了滿身的疥疮，除了一条露屁股的褲衩，什么也沒有。人家要我賠衣裳还不算，将来是死是活也不敢說，十来岁的孩子，长得还没七八岁的高，人家要我干什么？

眼看快天黑了，叔叔說：“你在这儿等着我，哪儿也别去。”說完就走了，一直也沒回来。天黑了，我餓得实在忍不住，只好各处去要吃，在一家舖子的雨搭子底下过了一夜。我知道叔叔再不会来了，想起长辛店还有个舅爷，就投奔了他家。

十五岁上，我总算找到一份差事，在浴池当了个小伙計，每天飯吃不上几口，却沒少挨打受气。十七八岁了，連一小車煤都拉不动，为什么？滿肚子都是野菜呀！使尽了全身的劲不算，还要抽你的血。

“七七”事变后，日本鬼子侵入南京时，当时我当小杂役。那天，工头讓大伙全去检查身体。到了医院，按順序經過一个个检查室。最后来到一个室里，日本大夫用中国話

說：“你的不要害怕，看看你的血。”接着就用一个很大的注射器，插在我的胳膊上，抽了滿滿一大管子血，我只覺着天旋地轉，頭暈眼花，差一點沒暈過去，回去以後真像害了一場大病。

事後我才知道，日本人抽了咱工人的血，是要送到他們軍隊中去，把傷兵救活，再去殺中國人。好毒辣的心！我轉念又一想，既然有傷兵，說明中國人民不是好欺負的。聽人說：“日本話，不用學，過了三年用不着。”看來真有道理。從此，我就想盡法不干活，跟大伙一樣，每天給他磨洋工。以後我又聽說八路軍打日本，心里就暗暗盼八路軍快打過來。

不久，我被調當錘工。有個外號叫大傻子的日本人，打人打得最凶。一天，平白無故揍我一頓，說我沒干活，因為我的臉不夠黑。我這才想起上班後忘了往臉上抹油泥。回去後，實在覺着累，就歇了一天。沒想一上班，又碰上了大傻子，他凶狠地瞪我一眼說：“誰叫你歇工？”順手就抽出一根剛燒紅的鐵棍，沒頭沒腦地照我打來，我一時躲閃不開，一下打在臉上，又是疼，又是氣。心想：我父母的大仇未報，又來了你們這幫東西，從小挨打受氣，長大還受你們欺，豁出去跟你們拼了！正在打愣，大傻子早溜了，就這樣，日本人給我留下了一塊紀念——左眼下的傷疤。至今每當我照鏡子時，總想起這段事。

日本投降後，我想：這下好了，共產黨、八路軍要來了，報仇的日子有指望了。誰知來了一群國民黨劫收大員，全

是些摟耙匠，不管工人死活，就知道往自己腰包里摟錢，物价一天三涨，苛捐杂稅数不清。工人甬說拉家带口，連我这个单身汉的生活，都很难維持。

在大街上，我住的是最小最便宜的房子，为省点烧的，晚上总是一下做出好几頓飯，星期天还得跟日本統治时期一样，想办法出去打个卯子——做个短工，拾点庄稼什么的。难怪人家不願把閨女嫁給工人，咱养不起呀。

我总算走运，二十九岁上，同院伙友給說了个穷人家的閨女，結婚时連床被子都沒有，怎么过呢？拣煤核、拾庄稼、吃糠嚙菜，苦熬苦曳又混了一年多，总算盼到了解放。

姐 弟 回 國
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，是长辛店解放的日子，这是我們真正当主人的日子，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上飽飯的日子，我一輩子也不会忘記这一天。

第二年春天，一个星期天，我正在屋里坐着，忽然院里有人打听有沒有姓葛的，我忙迎了出去，見来人約摸二十七八岁，一身农民打扮，我一面答应着，一面就問：“你是誰？”他說：“我小名叫福生，从小……”我一听是老三，这心立刻就酸了，想不到，这么些年他还活着。这工夫，他也看出我来了，迎上来說：“你就是大哥吧？”我說：“对，对，哎呀，兄弟，你怎么找来的？”說着赶紧把他讓到屋里。原来他一直在人家过苦日子，在那兵慌馬乱的年头，一直沒敢来找我。

靠着伙友們的帮助，第二天，我們又找到离散多年的姐

姐。她見我們還活着，又是悲又是喜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頓。原來姐姐在盧溝橋劉家長大後，嫁給了咱廠一個叫馬榮章的工人，好歹從舊社會熬了過來。說到後來，就短一個老二，聽說他被日本人抓了勞工，去了東北，一走十幾年，沒有音信。姐姐不免又哭了起來。

又過了一年，也就是一九五〇年五月間，老二有信了！有人說他當了解放軍，在北京部隊，捎信來讓我去見面，你說，這叫人多高興！我趕緊去了，嗚！老二膀大黑粗，穿着軍裝，挎着沖鋒槍，真帶勁！原來他在東北鏡泊湖那地方，被日本人押着修橋，以後又打短工，受盡人間的罪，好幾次差點喪了命。後來，多虧遇見了一個地下工作者，指給他一條光明大道——參加了解放軍，入了黨，跟着部隊打下了長春、錦州、沈陽，一直打到北京。聽他這麼講，我心里真有說不出的痛快，像老二這樣，才真稱得起是老葛家的後代。臨走我對他說：“兄弟，給爹報仇的事，就指着你啦。”老二笑了笑，說：“國民黨反動派和土豪地主們，跟天下的窮人都結了冤仇，我一個人怎能報仇？得指着共產黨，指着全國人民，打倒蔣介石，解放全中國。把全國人民的大仇報了，咱家的仇也就報了。你說對么？”我說：“對！兄弟，行啊，好好幹！”說起來真叫人高興，要不是共產黨，兄弟們這輩子哪兒還見得了面？

黨給我們報了仇

一九五一年六月底，一天，我正在車間干活，黨支部書

記走来,对我說:“老葛呀,你知道嗎?‘二七’罢工时的鐵路局长,那个大坏蛋赵繼賢被逮住了。”“什么?赵繼賢被逮住了?”“对,現在在郑州,要开控訴大会,你去吧。”“好哇!”我的心咚咚直跳,二十八年啦,这一天可盼到啦!

跟我一起去的还有刘炳波、吳艳荣等几位“二七”工友和烈士家屬,我們一下車就受到了政府有关部門的热情接待,在郑州开了控訴大会,押着这个罪魁祸首遊了街,然后又把他押到了汉口江岸。在江岸,开了公审大会,好多受害烈士家屬控訴了他的罪行。赵繼賢瘦长的駝脸上,长着个雷公嘴,低着秃脑袋,对罪行一一承認,当政府宣判赵繼賢死刑立即枪决的时候,我激动得掉了眼泪,在江岸車站上,我亲眼瞅着枪毙了这个仇人。

不能忘本

一九五二年,党委批准了我的請求,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第二年,工厂在西峯寺、西山坡盖滿了宿舍,我又搬进了第一批盖的老紅房。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,我的爱人也进厂参加了工作。我們一共有六个孩子,五个大的都上了学,大閩女都上中学了!要是在旧社会,甯說上学,我拿什么养啊!

一九五一年,我二兄弟参加了中国人民志願軍,在朝鮮立了战功。一九五三年十月复員回来了,分配到咱厂鍛工車間,如今已是个好样的氧气工。他家就住在我东边的宿舍里,大孩子也上了学。我三兄弟,解放后参加了鐵路基建

工作,几年来一直在新疆修建铁路,早已入了党,我们常有书信来往。我姐姐也常来串门。逢年过节的,大家带着孩子都要在一起聚会。厂里的领导同志也常来探望,有什么困难,立时就会得到党的关怀和帮助。

在机车车间,我经常干的是车架的鞣箱滑动面等活。这活是上工序稍一拖拉,下工序就受影响,自己完不了不要紧,后面多少工序都没法干,这是直接影响修车进度的大事,谁不着急?怎么办呢?我想了个笨法子——加油干!上班前吃饱喝足,睡够觉,早去一会儿把工具准备好,开工就打冲锋,中午吃完饭在家呆不住,进厂更等不了,抄起就干。一回,主任碰见,问我是什么班。我假装着说:“刚来。”其实早干了不少时候了。打夜班时,时常错过吃饭时间。同班几个小伙子,也跟着干开了。我们每人一个砂轮、一台车的滑动面,一撒欢儿就完。就这样,用不了几天工夫,我们就完成了计划,接着,就超过了计划。刚拆的车,一夜工夫,我们的活就干完了。一九六二年,我们小组被评为厂级先进集体。以后,我们一直保持先进单位的荣誉。在小组会上,同志们说我起了骨干带头作用。依我说,这还是刚开始,距离党的要求还差得远呢!

我常想,今天的日子太好了。可是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。只要咱们跟定党和毛主席,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。可有一样,生活多好,咱们也不能忘记过去的苦,忘了过去的苦,就不知道今天的甜打哪儿来。我们厂盖“二七”纪念馆,每年“二七”开纪念大会是为啥?我想就是为了这

个。在家里，我常搬出我們厂的厂史，讓孩子們讀讀，为的是讓他們看看爷爷、奶奶是怎样死的，好日子是怎样来的？我媽活着时，常嘱咐我：“长大后要长志气，給父亲报仇！”如今，我也常嘱咐孩子們：“长大后，要长志气，要永远不忘本，要永远听党的話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！”

(郭若楷 整理)

憶父話家史

招待所工人 吳 艷 榮

我是“二七”烈士吳禎的女兒。爸爸鬧罷工犧牲的時候，我才十六歲。吃人的舊社會奪去了我的爸爸、弟弟、妹妹和女兒，這些血海深仇我是永遠也忘不了的。

我七歲的時候，家住在長辛店的高家墳，靠父親在鐵路工廠做工养活一家人。那時，父親還是一個手藝不錯的鑲大鞋襪的工匠，一個月只掙十塊半洋錢，一家九口，連最低的生活也維持不了。我每天只得跟着姐姐出去揀煤核，拿家來燒。那時，吃的全是野菜團子、菜粥，哪見過淨米淨面？什麼酸榴、豬馬尾、刺菜、榆樹葉，只要是能吃的全吃遍了。媽媽怕爸爸累壞身子骨兒，單給他蒸點淨面的窩頭，爸爸也捨不得吃，掰給這個一塊，那個一塊，分完了自己去吃菜餚。為這，媽媽常常和爸爸吵架，媽媽說：“一家大小全靠你掙錢养活，你身子骨累壞了，叫我們怎麼辦呢？”

爸爸說：“孩子跟着我够苦的，成年累月這麼熬，得讓她們吃點好的。”

那時，我們要是吃上一頓烙餅或炸醬面，全家高興得就

像是过年。平时穿戴,更甭提,爸爸一套衣服要穿四五年,冬天的棉袄,到了春天,拆下棉套当夹袄,夏天再去了里儿当褂子。晚上一家人扯着一条破被子,我不记得这条被子盖了多少年,只见被子全是补钉,实在没法补了,就用浆糊往上粘。

我们冬天出去拾煤核、拣破烂,都没有棉衣穿。棉鞋补了又补,常常露着脚后跟,把脚冻得裂了口子,活像张着的小孩嘴。就是爸爸也经常穿着拾来的“差般”(两只不一样)鞋。大姐十三岁那年,一个冬天的早晨,西北风像刀子似的刮着,她出去拾破烂,走到十几里地以外的大灰场,突然犯了羊角疯,当时没人发现,活活冻死了。弟弟得了脑膜炎,没钱治,也眼巴巴地看着断了气。三岁的小弟弟,因为吃不着,喝不着,营养不足,得了水臌症,不到半年也死了。家里只剩下我和两个妹妹。就是爸爸也因为成年累月吃食不济,得了大脖子病。在那饥寒交迫穷人没活路的日子,党来到了长辛店,办起了劳动补习学校。

爸爸从来为人忠厚,恨富爱贫。后来参加劳动补习学校,受到教育,认识到自己和阶级兄弟贫困的真正原因,就积极参加了为工人阶级闹翻身、争自由的革命斗争。

记得“二七”大罢工前几个月,爸爸每天总是挺晚才回来,有时妈妈等门直到深夜一两点。为这,妈妈常常跟他叨叨,爸爸总是和藹地说,是给人家说合事。后来才知道爸爸没黑没白地忙,是为了工人兄弟争自由、争人权,和反动派作斗争。爸爸平时见了富人走得远,见了穷人走得近,街坊

邻居哪家出了事儿，都找他。哪怕家里揭不开锅，他也先照顾人家。正因为这样，伙友们都特别信赖他。长辛店铁路工人成立工会，他就被大伙选为工会委员。当了委员以后，办事更认真、积极了，家里生活再困难，经他手的工会的钱，分文也不动，为了工会的事，赴汤蹈火也不犹豫。

“二七”罢工的时候，爸爸担任调查团副团长，专门带领调查团员，探听消息。罢工开始后，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，一面威胁、吓唬；一面进行欺骗。他们的阴谋失败后，又伪造假开工，欺骗工人复工。

一天，工厂里忽然传出“叮噹”的铁器声，十多丈高的老烟囱冒出了淡淡的清烟，工人都急忙奔走相告。工会接到消息后，一面安慰大伙，说没有工会的命令不能上工；一面派调查团调查。爸爸接到这个任务后，忽然想起晌午在工厂门口路过，看见一队大兵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稀稀拉拉地进了厂，好像是冒充的大兵。爸爸心眼一动，心想：“不会是伙友里出了工贼，一定是那群冒充大兵的小子干的。”于是带着调查团员急忙闯进工厂，果然一点不差，那些大兵，东一伙、西一伙的，正抡着大锤，乒乒乒乓，一个劲地往铁筒子上乱敲，原来这一手专为听个响儿，欺骗工人复工。调查团员再往老烟囱跟前一走，只见工头邓长荣和大总管郭长泰都脱了长衣服，正亲自推着小车往锅炉房里运煤。爸爸见到，怒从心起，冲着郭长泰冷笑一声：“哼哼！好主意！”郭长泰吓得一扭身溜了。

爸爸上前就跟那些大兵说：“我们正在罢工，你们干

什么来了？”有人說：“我們是天津大沽口做小买卖的，是交通总长派人把我們招来的。”爸爸和他們講道理說：“咱們都是苦哥儿們，我們为了爭自由、爭人权，你們这么一来不就破坏我們罢工了嗎？”

有的人听了就放下了大錘。爸爸又把調查来的情况报告給工会，工会馬上把这些事，分头传达給全体工人，揭穿了敌人的詭計。

爸爸热心为工会、为工人階級办事，工賊們把爸爸当成了眼中釘。反动派在大規模鎮压工人的头天夜里，首先逮捕了工会委員。

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九二三年二月六日的深夜，工賊領着吳佩孚的大兵来抓我爸爸的情形：他們把爸爸从被窩里抓起来，爸爸一点也沒害怕，用力一甩，把抓他的軍官甩了一个趔趄。爸爸把腰一叉，气冲冲地說：“有話說，有事办，拉我干什么？……”大兵見爸爸身材高，力气大，吓得一个劲往后退。当官的一看这个架式，下令說：“来，給我打！”这伙大兵听了一拥而上，沒头沒脑地照爸爸身上就打。爸爸不服，气冲冲地質問說：“狗杂种，为什么打人？你們講理不講理？”

他們說：“誰叫你造反？打你还是好的，还要杀你的头呢！”

爸爸說：“什么造反！我們爭的是自由！”

那个軍官气得大吼一声：“給我綁走！”几个大兵就把爸爸的手臂倒背着綁起来，推着走了。那陣正是腊月天，又



爸爸一点也没害怕，用力一甩，把抓他的军官甩了一个趔趄。

是半夜，刺骨的寒風颯颯地刮，爸爸身上連件棉衣也沒穿。

當天夜里，抓起來的還有其他工會委員，一共十一人，接着就給押上火車，送到保定府警察廳。因為案子大，又給送到軍法營務處。一進門，就用腳鐐、手銬、脖鎖，從頭到腳給爸爸扣上了。腳鐐的鐵鏈，有八九斤重，很快就磨破了腳上的皮，最後都紅腫潰爛了。晚上三個人拴在一塊，誰吱聲，看守的張口就罵，動手就打，大便也不讓出門。

在獄里幾次串問，爸爸都沒有低過頭。為這，受了不少重刑。

一次，大兵扒光爸爸身上的衣服，吊在梁上，拿大皮帶沒頭沒腦地抽，滿身被打得一道紫、一道青。爸爸是個硬漢子，敵人怎麼拷打，他也不屈服。他們又拉爸爸出去跪鍊，兩個大兵卡着胳膊，把爸爸額尖鐵鍊盤成的錐上用力一推，鐵尖扎進肉里，全身火燒似的疼痛，連筋都扎斷了，爸爸還是不屈服！後來，媽媽去探獄，見爸爸蜷着腿躺在地上，站也站不起來。爸爸怕媽媽傷心，就說是腿受了寒，其實是筋斷了，伸不開腿。臨了，爸爸對媽媽說：“我當下出不去，你好好帶着孩子過吧，將來咱們工人有出頭的那一天！”

四五個月過去了，爸爸在獄里染上了重病。大伙為了救爸爸，再三要求牢里派人治病，他們却理也不理。爸爸的病勢一天天嚴重了，最後，他終於受盡折磨死在獄里，他直到死也沒有屈服！

父親死后，剩下我們姐妹三人和媽媽。

我是家里的大孩子，懂得媽媽的心情，我就和媽媽一塊

給人家縫縫補補、洗洗涮涮，攬点活做。小妹代替了我过去的差事，天天出去拾煤核。这时，党派来了一位学生打扮的青年，两次到家安慰母亲，問长問短，每次还留下几十块钱。第二次临走，那位同志留下了地址，告訴媽說，他以后就不能来了，有困难就按地址去找他。后来媽媽找过他两次，都拿回几十块钱。那时，随时都会出事，以后媽媽再去找那位同志，就沒找到。媽媽回来时說：“咱們不能光靠人帮助，自己要多攬点活儿，多挖点野菜，怎么难熬也要活下去。”

可是，在那个吃人的旧社会，上工的人家还缺吃少穿，我們家沒个上班的，当然就更受罪了。不管怎么省吃俭用，白天黑夜地拼命干，还是吃了上頓愁下頓，有时就揭不开鍋。就这样混了一年多，实在沒有出路了，媽媽就想法給我找了主，還沒等过門，軍閥吳佩孚的军队抓兵，就把我未婚夫抓走了。

四年后，他开小差跑回来，我們才成了家。我过門以后，仍然过着和从前一样的日子。

我丈夫原来在鉄路上工，日本进关以后，因身体有病，受不了日本人的气，从鉄路上下来卖零工、当苦力，秋天就下地拾庄稼。有时实在沒轍，我也到外地做小买卖。

在旧社会，本来就沒有咱穷人的活路，妇女的遭遇就更惨了。我生过九个孩子，第四胎是个男孩。那是一九四二年，日本人对中国人統治得更紧。家里沒有隔宿粮，能换几个钱的东西都卖光了，炕上只舖着一张破席，沒有一条被

子，孩子連块尿布也沒有。正是寒冬腊月里，孩子落生，屋里沒个热气，沒鋪的，沒盖的，小腿冻得紫一块、青一块的，看着真叫可怜。大人沒有吃的，孩子沒奶吃，餓得一个劲直哭。我只好抓两个盐粒子冲碗水，喝了催奶。街坊隣居知道后，送給几碗小米才解了难。为了拾点煤焦做飯、暖屋子，生了孩子十几天，我就上火車道上拣煤渣。坐月子着凉、挨餓，給留下了腰疼、筋疼、头晕的病根，直到現在还常犯。孩子也因为又冻、又餓、受了风，不到一个月就死去了。

生第五胎时，家境还是这样。我想了一个主意，給人家当奶母，拿自己的奶，喂人家的孩子。剩下奶，我的孩子就吃一口；剩不下，就喂点米湯，糊弄糊弄，弄得孩子瘦得大眼儿灯似的，看了都吓人。我这苦命的孩子，只比上一个孩子多活了几个月，后来出疹子，沒錢治，眼看着也扔了。

我出嫁以后，媽媽一个人怎么生活呢？我們姐儿几个婆家都穷，哪儿有能力养活她呀！她老人家看到我們都拉家带口，不願意牽累我們，就出去給人家当老媽子。从东家到西家，侍候人二十多年，一过六十岁，腿脚不灵了，半夜守着太太、小姐們打牌，站得腿都上不去床。我就把媽媽接回来，給我管着家务，我去給人家使喚……。

我們一家就是这样在苦海里熬了三十多年，直到解放軍打过来，才算熬出了头。

一九四八年长辛店解放了，工人階級翻了身，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。爸爸生前的願望终于实现了。我喜出望外，积极参加了街道工作，一天到晚在外面跑，协助政府发动

家屬搞衛生，動員家屬抗美援朝、捐獻飛機大炮……。

解放後，黨給工人撐腰，在工廠展開了說理鬥爭。騎在工人頭上作威作福的工賊被鬥倒了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給槍斃了。殺害我爸爸的劊子手趙繼賢，在一九五一年被追查歸案，工廠還叫我到鄭州、漢口參加了控訴大會和公審大會。政府根據法令和群眾的要求，當下就槍斃了他，為“二七”死難的烈士報了仇。

一九五一年九月，我進工廠參加了工作。兩個兒子都在一個機械廠當工人。我們住着工廠最早蓋的工人宿舍。隨着國家的富強，家裡生活逐年得到改善。每人都有幾套衣服，一套被褥，人人有穿有戴，有舖有蓋。前幾年還買了收音機、自行車。閒暇時候和孩子們聊天，就講他老爺同反動派鬥爭的故事，講舊社會受苦受罪的生活。告訴他們今天的好日子可來得不容易，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疼。

我的小兒子是解放後生的，真是在蜜里長起來的。他聽我講舊社會里的地主、工賊、軍閥怎麼壓迫人、剝削人，就問我：“舊社會工人真這麼苦嗎？”“舊社會真這麼不好嗎？”我就讓他大哥講小時受的罪給他聽。

我的大兒子說：“我十二歲那年剛上小學，日本人今天要勞工，明天要出伏。一次，拉人去修路，咱們家全靠爸爸掙飯吃，他不能去，我替爸爸去了。我腿上長着一個瘡，干累了稍微直直腰，讓監工的日本鬼子看見了，就對我衝着太陽跪在亂石頭子上，腿上的瘡流的濃血都粘在褲子上……”

我的小兒子，現在一吃窩頭就不高興。我就跟他說：“你

吃一頓窩頭就喊苦，你大哥像你这么大，还常饿肚子呢。”他大哥告诉他：“我们受的罪你做梦都想不到，吃顿窝头都希罕得不得了，哪穿过新衣服！鞋破了就张着嘴，夏天就光着脚。哪像你似的，要买鞋就买鞋，要买衣服就买衣服。”

由于我经常向孩子讲家史、厂史，进行回忆对比的教育，他们都特别热爱新社会，热爱共产党。大儿子身体不太好，八九年没请过假；二儿子是个炼钢工，他不怕累，不怕热，工作中不挑不拣，从不喊苦。有一次拉料，装着一千多斤的大车把他的腿砸青了。领导上到家慰问，让他休息几天，他一天也没歇，第二天爬起来就上班去了。

我自己想起过去的苦，更感到今日的甜。去年我老伴一条腿得了骨结核，交了六块钱就住了医院。又打针，又开刀，没多久就治好了，要是在旧社会非送了命不可。

我在厂子里工作了十几年，总是想法把活干好。我不怕脏，不怕累，不怕麻烦，能多干就多干。我就是干再多的活，也报答不完党的恩情，我要永远听党的话，永远记住旧社会的苦，新社会的甜，为党的事业干到底！

(王文儒 整理。张培力 插图)

牢記階級仇，不忘鬥爭路

“二七”退休老工人 孫茂林

我有個外孫女，名叫素珍，是個沒爹沒娘的孩子，我把她拉扯成人，上了中學，現在有了工作。那天，她從城里回來，我問她：“你有了學問，有了工作，可念誰的好呀？”

素珍說：“念老爺的好唄。”

我說：“不對。”

素珍說：“還念姥姥的好。”

我說：“也不全對。”

素珍說：“那還念誰的好呀？”

我說：“應該念毛主席、共產黨的好。沒有毛主席、共產黨，我這把老骨頭活不到現在，你這個沒爹沒娘的孤兒就沒有今天。”幾句話把素珍的眼圈兒說紅了，她很激動地問我：“我們怎麼念毛主席、共產黨的好呢？”

我說：“要永遠跟着毛主席、共產黨走，要永遠聽毛主席、共產黨的話，要永遠記住過去……”說到這里，素珍非讓我講講過去的家史不可，說實在的，我平常是不願講過去那些傷心事的，可是我知道，教育孩子是保無產階級天下的大事，

这我不能不講。我說：“孩子，你坐下来，听我从头慢慢給你說說。”

洋鬼子害死我的父

我今年六十六岁了，从我記事的时候，我們家就穷得叮嚙响。記得那时我常常这样唱：

老咸菜擦窩頭，
熬野菜沒有油，
白开水順碗流，
爸爸媽媽還发愁。

当时，老爹爹就在这个工厂做工，受的是外国人的气。有一次，有个比利时厂长，穿着亮光光的尖皮鞋，手里拿着文明棍到厂里来蹓躑，从我父亲干活的地方路过，一脚踩在冰块上，把这个洋厂长摔了个大屁股蹲儿，这下他急了，站起身就大罵，伸出拳头就打。我父亲急了，就問他：“你为什么打人？”

这时，陪着比国厂长的中国总管孙瑞章，搶前一步說：“你这不长眼的东西，打你是好的，要是摔坏了厂长，你担得起这外交責任嗎？”罵完，他們就走了。过了不大会儿，听人說出布告了，布告上写着罰我父亲一天工錢。

我父亲一气之下，得了一场大病，不几天就死了。临死的时候，他把我叫到跟前，有气无力地說：“孩子，記住爹的

話，長大了別吃洋工。在工廠做工，受外國人、總管、工頭的气，比當童養媳還難哪！……”父親沒有說完，就嚥了最後一口氣。這筆大仇大恨，我一輩子也忘不了。

老狐狸黑心爛肚腸

父親活着的時候，我們家就是進門來無米無菜，出門去沒穿沒戴，窮得連雙鞋都穿不上。要按我爹的話來說，就是掙這倆錢，連喝西北風都不夠。生活實在沒辦法維持。有一天，我媽跟我爹商量：“咱們租地主點兒地種吧，也別在一棵樹上吊死。”

我爹說：“唉——誰種啊！”

我媽說：“我種，再說茂林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我們娘兒幾個種。”

當時我才九歲，因為缺吃少喝，長得又瘦又小，可我已能幫爹爹、媽媽干活了，我常出去拾柴、挖野菜。我說：“爹，我會撿糞，……”爹聽我說這話，看了我一眼，傷心地扭過頭去，又回過頭來摸着我的頭說：“孩子，你命苦啊！”爹哭開了，我也哭了。

我們租種了地主二畝地，每天早晨，天不亮就起來到野地裏去撿糞。嚴寒的冬天，冰封河，地裂口，可是我還穿不上鞋襪，只是換了人家一雙破鞋趿拉着。我的腳凍裂了，那鮮紅的口子，就好似小孩張着嘴，鮮血不住往外流。可我並沒有哭過。我心里總是想着，將來地裏長出了好庄稼，我們就能吃上一頓窩窩頭了。

那一年，我們一家人起早貪晚，在地里緊忙活，谷子穗長得足有一尺來長，老玉米長得簡直像個大棒錘，庄稼長得好極了。過路的人看了都說：“啊——這庄稼，真強。”知底的人看了以後說：“啊——老孫家今年可翻身了！”我們一家人听了，自然是笑在脸上，喜在心上。可是這消息地主也知道了，他走到地邊，立刻瞪圓了兩個牛眼，捋着山羊胡子，哈哈大笑起來，笑完，他狠了一下心說：“好——！”

到了大秋，糧食剛剛打下來，地主就來逼租子了，只見他的鉄算盤叭啦叭啦地响了一陣，就把我們打下的那點糧食，全給扒拉進去了。剩下的只是一堆谷秕子，真是使人寒心哪；當時我家有五口人，因為養不活，就把我姐姐給了人家。

破土屋小柱兒送命

父親活着的時候，我們就住在玉皇庄。住的那間破土坯屋，人們常常管它叫“五風樓”，因為它四面透風，房頂上也有窟窿，到了冬天，刺骨的寒風拼命往里鑽；到了夏天，一打雷，房頂掉土；遇到下雨天，外邊大下，屋裡小下，外邊不下，屋裡還下。就是這樣的破房，每月還要交一塊錢的房租。

這些破房子，都是地主老財的，他們蓋這些破房，是專為租給工人住的，一個月交不上房租，就給轟出來。我在這裡一下住了三十多年，我的大孩子柱兒就是凍死在這裡的，當時那種悲慘情形，永遠刻在我的心裡。



到了大秋，粮食刚刚打下来，地主就来逼租了……。

柱儿当时才三岁，他是我的第一个儿子。那天，他忽然发起高烧来，这时正是冬天，我只好把仅有的一条破被给他盖上，孩子他妈说：“柱儿这病可不轻啊！找个先生看看吧？”我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唉！——钱呢？分文没有，拿什么给孩子看病呢！”说着，两口子都掉下了眼泪。发烧以后，孩子出麻疹，到了晚上，冻得孩子大嚷大叫：“妈妈，我冷啊！妈妈，我冷呀！”我说：“柱儿，来，爬在爸爸胸脯上来，这儿暖和……”谁知，出麻疹就怕见风着凉。没等天明，柱儿就死了。

为什么受外国人的气？

为了活命，一九一五年的夏天，我在长辛店铁路工厂上了班，那时我才十六岁，从迈进工厂大门那天起，我就像掉进了无边的苦海。当时，一天干十个小时的活，只挣三毛钱，一个月歇两个礼拜天，歇一天扣一天钱。这样，每月只能挣八块四毛钱，除去每月一块钱房租，剩下七块四毛钱，连一袋酸棒子面也买不了。一家人哪够生活呀，我每天只得饿着肚子上班。

平时在工厂干活，挨打受气不说，每逢三节（春节、端午、中秋）和两寿（工头和太太生日），还必须按时送礼，至少一元，多多益善。厂长祚曼是个比利时人，对工人非常蛮横，张口就骂，伸手就打。一天，他用法语叫我去找总管孙瑞章，我没听懂，他就破口大骂：“格松郎当居（混蛋）！”抡起手中的文明棍冲我打来。幸亏我眼快身灵，猛然一闪，他没打着。这位洋厂长扑了空，差点没摔在地上，这下

可火了，用文明棍指着我厉声大罵。正罵着，总管孙瑞章来了，他俩合着把我打了一頓。

平时，在工厂干活，工人連說話、喝水的自由也沒有。記得有一回，我又飢又渴，剛端起碗來喝了一口水，可巧被总管看見了，他用手一指說：“罰你四毛！”

我說：“我一天才掙三毛，你罰我四毛，我一家人吃什麼？”

他把三角眼一瞪說：“好！你敢還嘴？罰你八毛！”

這窩囊氣怎麼受？當時我想，為什麼外國人總是欺壓中國人？為什麼中國的總管和工頭，總是和外國人一個鼻孔出氣，來欺壓工人？我們工人老受他們欺壓，難道真的是命里注定的麼？

“爭人權，爭自由”

一天，我正在廠里干活，有個工友對着我耳朵小聲地說：“孫師傅，好消息，有出頭的日子啦！”

“你說什麼？”

“勞動補習學校辦起來了……”

“什麼？學校？有咱們什麼事？”

“嘿！是專給咱們工人辦的，專講咱們工人的事，你去不去？”

“有這事？”

“半點假都沒有。”

“去！”

晚上，我們几个就去了，进了門，就坐在一旁听教員講課，先講“劳工神圣”，接着又講團結斗争的事。听着真是过瘾，渾身是劲。我想：这回非和他們干到底不成！

一九二三年二月初，我們鬧开罢工了，罢工那天，我正在工会执行任务，工人們停止工作后，一齐向娘娘宮涌来，史文彬拿着罢工命令，向大家說了总工会在郑州被破坏的經過，最后大声說：“工友們，咱們能不能忍受啊？”三千名工友像山洪暴发一样，喊着：“不能！”“不能啊！”史文彬說：“我們敢不敢斗争啊？”工人們宏亮地回答：“敢！”“坚决斗争！”“不得命令决不复工！”

罢工令下达后，工人糾察队把住了长辛店火車站和各个道口，南来北去的火車被截在长辛店。

二月六日晚上，反动派下了毒手，逮捕了工会委員史文彬等十一人。第二天，工友們都急了，一齐冲向火神庙警察局要人。这时，大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对着工人。葛树貴大喊：“工友們，往前冲啊！他們有枪，我們有血！”一时枪声大作，火神庙前变成了戰場，三千多名工人被馬队冲散，打死、打伤了几十人，这就是有名的“二七”流血慘案。

大罢工后的烏云

“二七”罢工失敗后，反动派对待工人更加野蛮了，工人生活更加悲慘了。后来工人們都哼着这么个調子：

平汉路變成了貧寒路，

失业的工人流落在街頭；
琉璃河成了流淚河，
眼淚比河水還要多；
長辛店變成了傷心店，
傷心的事兒說不完。
工人哪個能吃飽？
工人哪個能穿暖？

当时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，每天早晨起来，看到沉睡的工厂，不由就想起牺牲的烈士和被捕的伙友，热泪就止不住流下来。家里揭不开锅，孩子饿得哭天嚎地，这种悲惨情形，我永远也忘不掉。

一天，到街上去打听被捕伙友的下落，忽然听到工会让大家忍痛上班的消息。当时我想，难道我们伙友的鲜血就白流了？不，决不会白流。回到家，母亲把我叫到跟前，说：“茂林，再不上班，咱这一家人可怎么活？”我听了母亲的话，半句也没说。第二天，就迈着沉重的步子上班了，从此，我又迈进了这个吃人的虎口。

当时，军阀们三天两头打仗，闹得人心惶惶不安，提心吊胆。今天这个来派捐，明天那个来要粮。大兵们到了老百姓家，乱翻乱抢，弄得民不聊生。工厂里三天两头不开支，家里三天两头揭不开锅，工人们不断为开支进行着斗争。于是，国民党就想出了一个新的花招，给工人发“欠薪券”。

这“欠薪券”印得很漂亮，券面是一元、五元、十元、五十

元。一到开支，一个人給一大卷，然后每个月抽一次签儿，一百张中才抽出一张，每次抽签儿还得上北京去抽，抽上能鬧个車錢，要是沒抽上，車錢也得白搭上。我只好把五元、十元一张的券减价出卖了。那时候，专有买欠薪券的人，据说他們和抽签儿的勾着，当然就知道哪个号头能抽到了。他們出小錢买大票儿，到北京是大票換大票，就这样发了大財。其实，这些家伙里里外外都是喝得工人血。

亲人的遭遇

一九三〇年春天。一天，我們院里突然出現了一个年青人，他穿着灰色大褂儿，看年紀頂多有二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长得又黑又瘦，看起来身体并不太好。平时，他做卖燒餅果子的生意，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共产党员，是市委派下来做地下工作的。他的名字叫胡胜生，以后就住在我們院里。

他为人誠懇忠实，对人非常亲切。每天晚上，他到我屋里来教我学算术，可是我很不忍心，因为他每天忙得够戢，身子骨又很单薄。哪知道，胡胜生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他高兴得每天非教我不成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他認真地教，我也認真地学，夜里常常学到十二点。他常常忘記吃飯，我就讓他在我屋里吃点。

一天晚上，他教完了算术，我們談起心。我問他：“老胡，像你这样有学問的人，为什么不找个闊事呢？”胡胜生笑了笑說：“闊事？誰給我找？”回过头来又說，“我想考艺員养成所当学徒，你看成嗎？”我說：“成！沒問題，准考得上。”

艺員养成所招考的那天，老胡把挑子一扔就赶紧去了。考了回来，我問他：“你答得怎么样？考上沒考上？”老胡說：“大哥放心吧，我都答对了。”我听他考得好，心里滿高兴。誰知，事情出人意料，出榜那天，榜上沒有胡胜生的名字。原来艺員养成所的国民党官儿們，平日見胡胜生是个文弱书生，不像小买卖人，早对他有了怀疑，所以这回沒录取。

經過老胡的秘密活动，在工人中发展了一个党支部和一个赤色工会，在他领导下，以后进行了不少的斗争。

一天，我忽然听到有人要抓胡胜生。这是艺員养成所一个人給我說的，他說：“孙师傅，你得注意点，和你住同院的那个姓胡的是个共产党，准备要抓他呢！”我一听，吃了一大惊，心想，老胡这样的大好人，千万不能給逮走。老胡是站在我們工人一边的人，前几天，我和他到街上去，看見画摊上掛着一张画，画的是上海十九路軍打日本鬼子，老胡一見这画就站住了，他指着画对我說：“大哥，你瞧見沒有，軍隊后面有一大群工人，这就是說，十九路軍打日本，有工人的支援。”老胡多么关心工人的事，連画上有工人，他都注意到了。想到这儿，老胡的好处，一下都湧上了我的心头，我越想越着急。于是，就加紧脚步跑回家，把这事告诉了老胡，叫他快走。可是老胡还是那句話：“大哥，別怕，沒事！”

晚上，老胡和平日一样，吃完晚飯又来教我学算术。这天晚上，我学得特別好，老胡也很高兴。他对我說：“大哥，等你把最大公約、最小公倍学完，我再教你点代数，你还得学几个英文字母呢！”說完，他讓我做复习題，就又到別的工

友屋串門去了。就在这天晚上，老胡被捕了。以后，我和王元瑞到处打听消息，才听说在汉口被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。

走投无路的日子

“七七”事变后，日本鬼子来了，长辛店工厂的厂房上，吊起了日本旗，工人成了亡国的奴隶。进厂时，門崗把你当奸細，全身搜查你；出門时，把你当小偷，也搜查你。在厂里干了一天活，不敢洗手洗脸。誰若洗了，到門崗那儿說你一天沒干活，就揍你。一次，我在工厂看了一眼报纸，日本鬼子看見了，过来就打我几个大嘴巴。

回到家，更使人伤心，孩子大人穿着布不遮体的衣裳，不敢出門。吃飯时，全家只有一茶碗煮黄豆，因为我上班，我媳妇把黄豆倒給我一半，那一半給了三个孩子。吃的时候，真是吃一粒豆，掉一滴泪。生活实在沒法过下去了，我媳妇听说张家口那边好找飯吃，就带着三个孩子跟別人到宣化去了。

到那儿后，我二女春英被人騙走，卖给一个姓陈的財主家里。这个財主十分狠毒，一点不順心，就用棒子打、錐子扎。平时，也只讓喝两碗稀米湯。我媳妇回来談到这事，全家都哭起来……。

日本鬼子被赶走了，又来了国民党。苦日子連着苦日子，我說十天十夜也說不完。

紅日出來暖洋洋
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，长辛店解放了，这真是千年冰河开了冻，劳动人民终于见到光明了。那天早晨，太阳从永定河东头升起，一片红光照亮了长辛店。头天晚上，我一夜没合眼。早晨起来出去看动静，门一开，冷不丁把我吓了一跳，有几个军人已经站在我家门口了。一个大个子向我笑着说：“老大爷，您早，不要怕，我们是解放军。”我看那些当兵的，都穿着黄色的土布军装，戴着山羊皮帽子，穿着绑带的毛底鞋，说话又亲热又和气，我想，这大概是八路军吧？大个子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，解释说：“解放军就是以前的八路军，是毛主席的队伍，我们解放北京来了。”我一听他们是八路军，高兴得一拍大腿说：“哎呀呀！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”说着，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这一天，我永远也忘不了，因为这是结束我的苦生活，开始新生活的第一天。

不久，春英也被我们接回来了。

爱机器如爱孩子

解放以后，我仍然做着压风机的工作，不过和解放前比就大不一样了，解放前我是为的混碗饭吃。解放以后，是给自己干了。

一九五〇年，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当时我下了决心，保证不让机器发生事故。有人说：“看孩子有时还闹小毛病呢，何况机器？谁敢保证一点毛病不出？”我听了这种议论，起初也觉得有些道理，可仔细一想，不对，不能这么

想，應該以不讓機器出事故的高標準來要求自己，這就是我的決心。怎樣才能不讓機器出毛病呢？經過深思苦想地鉆研，根據每台機器的特點和自己的經驗，我制定了一套“勤看、勤摸、勤听，專心維護”——三勤一專的保養制度。

我愛機器如愛我的孩子一樣，怕它們頭痛腦熱，就經常去摸。到了夏天，由於它們常發熱，我就把僅有的一个電扇拿去給它們吹風。有人見我這樣做，笑着說：“孫師傅，你這人真個別，自己直淌汗，却拿電扇去搨死機器。”我說：“你這人不明白，機器太重要了。機器一壞，就會給咱們廠造成很大損失。”平時，我不敢用笤帚掃地，怕戳着它們。我知道，用笤帚掃地，會起塵土，落到機器上，會影響壽命。所以，我就讓老伴把家裡的破衣裳撕成布條，綁成墩布，用墩布擦地。為了機器的健康，我把自己全部心血都拿出來了。十年中，沒有發生過一件事故。

当好家，管好家

解放後，咱們當家作了主，怎樣把日子过好，是大家應該關心的事情。不當家不知道柴米貴，當了家就得勤儉持家，注意節約。像擦機器的棉絲啦，油啦，這些東西看着不顯眼，日久天長就是一筆大錢。像棉絲吧，一公斤就是一塊六毛七，我這三台機器，每月指標是五公斤，油是十七公斤，這錢不能算少哇！可是，我每月只領半公斤棉絲，有時這半公斤也用不完，每天把機器擦得很亮。有人納悶，就問我：“孫師傅，你領這麼點棉絲，怎麼把機器擦得這麼乾淨呢？”

我告訴他：這是我用業餘時間，揀來髒油棉絲，用黃土把油洗去，然後再拿來用的。

為了給國家節約一滴油，我也下過苦功夫。冬天天冷，油流得慢，就把油門開大些；夏天天熱，油流得快，把油門開小些。為了好掌握，我把油盅上刻了記號。這樣，既保證了機器潤滑，也節約了油，每月有十公斤油就夠用了。

我常說：“東西不怕少，收起就是寶。”一次，我銼完一個鉛扒根，把鉛末打掃得干干淨淨地收起來。徒弟看了很奇怪，問我：“師傅，要這干什么？”我說：“還能用。”徒弟說：“這麼大的廠子，還在乎這麼點東西？”我說：“你別這麼說，我們國家還在過渡時期，不能那樣大手大腳的。”徒弟听了，沒再說什麼。過了一個時期，我端出一碗鉛末，熔化後鑄了一個成品。我拿着這個成品對徒弟說：“那一點點的小鉛末，看着不顯眼，日積月累就成這大東西了。咱們搞社會主義建設也得這樣，從一點一滴的積累作起。”

培養接班人

我現在過的是幸福生活，吃的是白米，住的是大樓，穿的有呢子衣服，蓋的是大花被。晚上，躺在軟和和的床上，我老想：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麼來的？以後又怎樣把它守好？想到這裡，我忽然想起一個大問題：教育好青年一代，是我們老一代嚴重的責任。

解放以後，我一共培養了七個徒弟，現在他們都能獨立操作了，大部分都入了團、入了黨，有的還提拔為幹部，有的

成了厂級先进生产者。在培养他們的时候,我不只是教給他們技术,更重要的是帮助他們提高思想。青年如同幼苗一样,不只是需要水分,更重要的是需要阳光。和他們时时刻刻生活在一起,最能了解他們的思想变化,我就随时抓住他們的思想,对他們进行帮助。一九五八年,工厂新来了一批徒弟,他們刚学了几个月,就对我說：“孙师傅,开关車我們都学会了,換个‘瓦路’也行了,我們自己能独立操作了。”

我一听他們有了自滿情緒,就對他們說：“你們还没会,还差得多。我問你們：机器你們全摸清了么？”

他們紅着脸說：“那还不行。”

我說：“对,不能自滿,开车关車一看就会,可是要把机器摸得烂熟,那就不是一日之功,摸熟机器,才能保証不出事故。”

他們說：“那就难了,摸透了机器也保不住不出事故。”

我一听他們又有了畏难情緒,就對他們說：“不难,只要不自滿,用心学,就难不住人。”几句话把他們說得都笑了起来。

我說：“你們別笑,这是实情話,你們赶上好时候了,你們有文化,有党的培养,就看你們用心不用心了。”

他們說：“当然用心啦,不用心也对不起您給我們的帮助。”

我說：“是对不起党和国家。你們从上学到入厂,党和国家对你們下了多大功夫啊！”

从那以后，他們可积极了。徒弟向师傅学习，也是“听其言，观其行”，师傅不只是要說，更重要的是用模范行动影响他們。

我还經常給青年徒工講“回忆对比”，这法子能推动他們前进。一九五四年，来了个女徒工，叫张兆敏，是从技校毕业后进厂的。她很聪明，有文化，分配到我这儿来看机器。开始她就觉着“膩”，認為只“看堆儿”，学不到技术，没有什么出息。她一有机会就往外溜，总不肯呆在机房里。她的同学見了問：“兆敏，你在工厂干什么呀？”

“看坟！”

我知道她这个思想后，就千方百计地帮她进步。先从生活上关心她，发现她爱喝凉水，就把开水晾凉了给她送去。她爱花，我就从家里带几盆花来让她培植。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影响她，劝她看有意义的小說、电影，给她講老工人在旧社会的悲惨生活和斗争的故事。那天，我講了她父亲的一段遭遇。张兆敏的父亲也是一个工人，在敌伪統治时期失了业，得病沒錢治，最后活活餓死了。我这一提，她痛哭了一頓。我說：“今天世道变了，这是怎么来的呢？別說咱們的压风机不重要，一不小心出了事故，几百人都得停止生产。”这样，她逐漸对工作有了認識，一天天定下了心。有了进步，我就对她进一步提出严格的要求，起初，她自以为物理、电学都懂，看这几台机器不算回事，因而，工作常常馬馬虎虎。一次，竟拉錯了电閘，差点造成重大事故。我就批評她說：“平时以为自己了不起，現在，学的东西都到哪

去啦？”經我天天这么說，天天这么講，张兆敏成了一个好徒弟，学了一手好技术。从一九五六年起，就开始独立带班工作，一九五八年，也成为带徒弟的师傅了。

一九六一年我退休了。退休时，領導上給我講：“要好好养老，过过晚年幸福生活。”可是我在家里怎么也呆不住，又要求来党委資料室帮忙了。

把紅色家谱写下去

“老爷，您講完啦？”素珍問。

“不！”我說，“我們的家史永远也講不完，不过今天我就講到这儿。至于以后咱們的家史怎样，就得由你們自己去写了。”

（申耀增 整理。张培力 插图）

斗争的一生

退休老工人 郭 福

两夹攻 奄奄丧命

我是河北省涿县太平庄人，过去这个地方叫直隶省涿州新店庄户村。

我爷爷在世的时候，是个受苦的庄稼人，一家老小就靠着四五亩薄地，飢一顿、饱半顿地苦熬岁月。

有人劝我爷爷说：“老这样下去，还不是尽听肠子叫唤哪。村里有‘会地’，租几亩种种，好歹也进几粒粮食。”

爷爷一寻思：“租‘会地’种，曳折了脖筋也尝不着多少甜头。”可又一看，灶火上总是锅底朝天，下了狠心：“豁着伸出脖子去挨宰吧，租几亩种种看。”

“会地”就是村里菩萨庙会的有钱的“香头”，拿出钱来“借”给穷苦人置地，到了大秋打下粮食给会里交租。其实，这就是有钱的“香头”们，身不动，膀不摇，在穷人骨头里挤油吃。

爷爷租了几亩山坡地，一家大小顶着星星起，到“三星歪”才睡，本来山坡地就是“印子地”，累出油来，也奔不上几

成年景。这一年，偏偏赶上干旱，地晒得要裂，多少天来不见一个雨点，一家急得团团转，爷爷急得像是火上房，到了秋后，粮食颗粒未收。“香头”们照旧伸手要租子，爷爷想不出好主意，只好忍痛放了院里的几棵树，卖出去交租。几棵树又值几个钱，账还是还不清，最后，只好把地“当”给别人好还账。

“当地”就是把从会里借钱置的地，押给别人，有一定期限，在期限内拿钱赎地，到期不赎，地就归别人所有。

这就更坑害了爷爷，这边“香头”逼租，那边“押地的”逼账，两处夹攻，脖子上这根绳，越勒越紧。最后，爷爷得了一场夹气伤寒，不久就死了。

奶奶病 不治身亡

爷爷死了，过穷日子的枷板，就套在父亲的脖子上。

当时，正是八国联军侵占北京，清朝政府软弱无能，节节退让。河北正定以北的交通线和附近的村镇，完全落到外国人手里，他们到处掳掠抢夺，胡作非为。我们家里的几亩薄地，也被糟踏得不能再种了。

那时，我才五六岁，只好跟着父亲去打芦草，五更天动身，一走就是十几里地，打一天草也换不了一升半碗吃的。有时就给人家干点零活，打打短工混碗粥喝。家里的衣物典当折押，母亲经常对着锅灶唉声叹气。

我十二三岁时，老奶奶得了病，医治无钱，病情越发沉重，不几天就咽了最后一口气。但是没钱送葬，父亲就去找

大爷商量，託人卖了二亩地，买了一副“薄板”，才給老奶奶送了葬。

債逼門 卖妹还賬

地就是庄稼人的命根子，少了二亩地，就像塌了半个天，剩下三亩来地，也只能開頓能照見人影的稀粥喝，几个妹妹餓得又哭又叫。

一天，我和父亲又到外边找短工做，家里来了个串亲戚的，进门用眼一扫，見妹妹餓得精瘦，便对母亲說：“二妹子，瞧这几个孩子，长得寬眉大眼，赶上这个年月，跟着大人受罪，得想个法子才是呀！”

母亲說：“人穷路窄，有什么法子呢？”

串亲戚的說：“路倒是有，唉！怕你又捨不得，不如送一两个給人家，大人松心，孩子也享福。”

母亲心里一惊。串亲戚的接着說：“北京有个給衙門里管炭庫的人，叫赵三秃，家里缺个閨女，人家是錢粮不缺，你要是乐意，我託人去說說。”

母亲說：“別看我們人穷，可不是卖儿卖女的。”

串亲戚的說：“这不叫卖，你們送人家一个閨女，人家再送給你們一点什么，我是一手托两家，你們是好換好。”

母亲听了，一时也拿不定主意，就說：“回头跟他爹商量商量再說吧。”

傍黑，我和父亲回来了，母亲把送妹妹的事，从头到尾說了一遍，父亲听了，把头低沉了半天，母亲难过地說：“儿

女都是娘身上的肉，动哪个都跟拉自己的肉一样，明着是送，其实就是卖给人家，成了人家的人，挨打挨骂，任随人家，俗语说：打在儿身，疼在娘心呀！到那时候，就是哭也哭不回来了。”

母亲一边说，一边看着妹妹们，一个站在母亲身边；一个躺在土炕的破席上；一个坐在地上，小眼直勾勾地看着母亲；一个贴在母亲怀里，死死地不放那干瘪的奶头。母亲摸摸这个，摸摸那个，真是娘身上的肉爱不够啊！

这当儿，忽听门外有人喊了一声：“老二在家吗？”

原来是菩萨庙会的“香头”走进屋来，跟父亲说：“老二呀，如今年月不好，钱越来越毛，会里的地打算收回去。当初，老爷子在世，还欠会里几十块钱，日子也不少了，咱们本乡本土的，也不说什么了，如今就难为兄弟你帮个忙了。”

父亲想再求他缓一步，又一想，求也是白搭。心一横说：“好吧，我们还钱，可得再容三五天。”

“香头”走后，父亲一屁股坐在炕上。

母亲发愁地问：“你说得那么脆，拿什么还呀？”

父亲看了看妹妹，心痛地说：“没有路，只有走你说的那条路啊！”说过，泪水扑簌簌地掉下来了。

过了一天，那个串亲戚的来了，母亲哭着把小妹妹递过去，小妹妹哇哇地哭叫着。母亲就像刀子绞心一样，泣不成声地说：“孩子……跟你大姨……找姥姥去吧……”

串亲戚的抱着小妹妹走出门，她不停地叫着、哭着，离开了家。

过了两天，串亲戚的送来了五十元钱。

切面舖 含泪学徒

日子越过越紧，母亲为了过日子，簡直都撕碎了心。

这时，我已經十五岁，半大小伙子閑在家里也觉着心煩，就由老街坊举荐，到北京天利斋切面舖去学徒。

临走前那天晚上，母亲把我攬到身边，抽抽泣泣地說：“儿啊，明几个你就上人家舖子里去啦，要好好学手艺，听說，端人家的飯碗可不易呀！”說着，母亲的眼泪順着她那焦黃的脸流下来，我也哭着俯在母亲怀里。

第二天，我就夹着一条破棉被，上北京去了。

到了天利斋切面舖，先学摘掛幌子、点火扫地、垒炉搭灶、合面軋面。軋面这活茬是个苦事，鸡叫五更就得爬起来，合好了面，坐在槓子上“哐啷、哐啷”地軋个不停，劲头用不到，面軋不磁实，就得用力在槓子上滚动。乍一干这行，把屁股磨得生疼，腿也发胀，看見案板心里就发慌，屁股往槓子上一沾，就像針扎了心一样，天天如此，哪一天也不能誤了五更。真是“徒弟，徒弟，熬过三年一节真不易”。

白天忙得手脚不拾閑，到晚上，人家都睡了，我还得擦灯罩、刷案子、筛炉灰、拾煤焦，一直干到过半夜才能睡。睡觉也沒个床舖，只是两条板凳一併，經常是睡着睡着渾身一陣寒顫，就冻醒了。睜眼一看，自己从板凳上滾了下来，在冰涼的地上睡了一夜。

赶到开春买卖少的时候，还得挑着挑子游街串巷，或是

到乡下去卖杂面、火烧。

十冬腊月里，还要扛上装着几十斤綠豆杂面的大筐籬，到齐化門（朝阳門）去卖。門洞里呼呼的穿堂风，把破棉袄灌个滿，冻得“噤噤”打战，嘴里还得吆喝着招攬买主。大冷的天，来往行人又不多，摆上一天，喊哑嗓子，也卖不出几斤去。但是，杂面被风一吹，容易发干短分量。回去以后，掌柜的一看，錢卖得不多，分量亏了不少，少不得又是一頓拳头、巴掌。

东岳庙 隆冬送餅

齐化門外有座东岳庙，离齐化門二里来地，每逢初一、十五办庙会，城里有些行业，赶来做买卖的，就都到天利斋买大餅。掌柜的一見生意兴隆，油水不小，自然是呲牙咧嘴，乐得两眼眯成一条綫。可是，我每天就要跟二百多斤面打交道。那陣，我刚十五六岁，又瘦又小，跟好几袋白面来回“折腾”，真够餓！

再說，买大餅的有的搭伙，买上三五十斤，买主自己拿不了，柜上就一趟趟地送。这送餅的差事，也得写到我的賬上。不論暑伏六月，还是腊月三九，两条腿总是閑不住。

就这样整天柜里柜外地忙合，常年累月也不讓洗回澡，又没有替身的衣裳換，衣裳上的虱子都成了串，用手一拨拉就是半酒盅。

一次，不留神把脚歪了，肿起挺高，掌柜的也不給治。后来，为了一件小事，和掌柜的頂起了嘴，我实在忍不下去

了，吵了一通，就不干了。

上铁路 忍气吞声

回到家，治好脚，只好打打草、拾拾粪，给人家干点零活，混过了半年。

这时，铁路上招小工，当时我也是十八岁的大小伙子了，就託人设法，在涿县一带道班上当了小工。

上工的头一年是筛石头子、扛道木，死命地干。到了第二年，就改为长牌（即正式工），一个月开六块现大洋，谁知一天工头跟我假亲近地说：“小工改长牌不易呀，这是我跟大头给你说了几句好话呢。”

我一听，连忙说：“我得谢谢您呀！”

工头冷冷地似笑不笑地说：“哼哼！光说个谢谢，这不是嘴上抹油的事，得来个‘丈母娘疼女婿’——实顶实呀！”

他的意思是让我拿钱“喂喂他”，我简直要气炸了肺，真是“见缝就下蛆”。可是敢怒不敢言，要不答应他，就许刷下去，只好忍气吞声地给他一些钱。就这样，被工头喝了我一年的血。

后来，实在忍受不下去了，转过年来春天，我就不干了。来到隴海线，找到熟人介绍，又上了铁路，混了两三年。

渡远洋 初到法国

一九一七年，听说南京有招华工去外洋的，能多挣几个

錢，我就在鐵路上辭了工，到南京報上了名。

等了半个多月，才动身。坐上火輪，開出上海海港，只見一片汪洋大海，一眼望不到邊。一路經過香港、西貢、新加坡等一些港口。船在西貢停了幾天，上煤、上水。看見碼頭上西貢的腳行苦力，扛着重活來來往往，一個個累得連喘氣、擦汗的工夫都沒有。心想：到了法國也就是這個滋味，原先掙大錢的念頭，不由得在心里涼了半截。

一連走了幾天，經過幾個海峽，最後，到了法國的馬賽港。

下船後，被安置到一個地方。先受一番“檢查”，看看身板、掄掄胳膊、踢踢腿。然後，洗澡、打針，這還不算，最後又借口講衛生，讓中國人把胳膊窩下的腋毛全剪乾淨。大家一聽，火往上冒，紛紛提出抗議。

有人說：“這是想着法欺侮中國人，真讓咱們毫毛不剩呀！”

有人說：“哼，休想！咱們這腦袋可不是面揉的，想怎麼捏就怎麼捏！”

大家齊聲說：“對！”就一起找法國兵說理，可法國兵一定要剪。不剪還要打中國人，誰能吃這個啞吧虧。大家說：“許你們放火，不許我們點燈，沒門兒！”就拿起石頭、棍棒跟法國兵干。他們看中國人多，打不過，就下毒手開了槍，打傷了我們兩個人。大家更是火上澆油，齊聲表示：“不成，說什麼也不能剪！”後來，派出代表跟他們交涉，才算取消了這項“檢查”。

兵工厂 三打工头

在法国，什么活都干过，种过葡萄，卖过苦力，给法国政府修建过花园……。

后来，又在一家兵工厂干烧汽炉的工作，整天和铁锹、烟煤打交道，一天要干十二小时，累得胳膊发酸腰发板。晚上回到住处，躺在床上就起不来。

咱们给法国人干活，可谁也不能认为中国人就低人一等，大伙经常和法国工头干起来。

有一次，一个伙伴来我烧炉的地方喝水，刚喝了两三口，让一个法国小工头看见了，气呼呼地走来，指着我们“哇啦哇啦”地叫起来，意思是说：工作时间不许喝水。

我说：“这是我的朋友，天气太热，喝一碗水就去干活。”

小工头说：“不行，喝水就误时间。”

我一想：喝一口水都受限制，就说：“活要干，水也不能不喝呀！”

这一来，小工头就火了，上前一步，举起拳就朝我鼻子打来，我用右胳膊一挡，小工头向后来了个趔趄，转脸见煤堆上有铁锹，抄起就朝我肚子打来，我一看，心想：好小子，动家伙啦，你可不是铜金刚、铁罗汉，叫你也尝尝我的滋味。就抬脚朝着小工头的手腕子铆足劲猛地一踢，只见铁锹“蹭”的一下飞出老远，“噹啷啷”落在地面上。小工头疼得一个劲地摔手、咧嘴，可他还不服输，举拳又朝我打来，我左手

一搥，右手一拳，着着实实在地打在他的胸脯上，小工头差点来个面朝天，我紧跟着搶上一步，指着他說：“你欺侮中国人就不行，今天把你打了，是打官司是告状，找誰都行。”

小工头一看打不过，“哇哇”了两句就走了。誰知这次打了他，往后这个小工头倒假装老实了。

两被逐 离法赴苏

自从打了小工头，大家也都出了一口气，这一来，認識的人更多了，其中就有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同志們。他們大部分是留法的勤工俭学的学生，也有工人，在华工中組織建党活动。

一九二四年，我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入党后，我一直照着党指的道路走，党怎么說，就怎么办。

为了便于斗争和进行工作，大家要学法国話，就再三地去交涉，請教員、找地点，組織学习。

我还参加了工人小报的活动，担当卖报工作。报上經常刊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息。凡是中国的飯館、旅店、商号……，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，就到处去卖。

这样，活动的面越来越大，法国資本家知道了，一张条子，就把我开除了。

后来，又在一家电車厂做工。一次，五一节，和法国工人兄弟一起，手挽手、臂挽臂上大街游行示威，反抗資本家压榨，又被資本家开除。

此后，就东跑西奔，这个厂干几月，又跳到那个厂；跑

了这省,又去那省。在法国跑了好多省,走了不少地方,到处奔波、流浪,就这样过了十八年。

十八年的光景,我懂得了阶级压迫的原因。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是亲兄弟,只有团结起来,拧成一股劲,打倒资产阶级,才能得到彻底的翻身。

一九三三年六月,党组织决定送一批同志去苏联学习,我也一起到苏联学习了一年多。

窩家門 上山找党

一九三四年冬天,我离开苏联回国。到了上海,按照党指示的地点去接头,谁知同志们已经转移了,没挂上钩。

我只好又来到隴海綫,找老伙伴謀了个事,主要的是找党联系。

一天,在铁道边踟躕,忽然看见一个铜钱,拾起一看,心里痛快得了不得,原来是一个苏维埃铜钱,两眼看得出神,像得到宝贝一样,真是攥在手里,暖在心里。

在隴海綫干了几个月,还找不着头绪,又到北京跑了一阵,还是没接上关系。找不到党,看不见同志们,心里一阵一阵感到难过。总这样下去也不行,就只好又回涿州老家去了。

自打我离家后,家里的日子更是紧上加紧,连种的芍药花和芍药花根子也卖了出去。可是吃饭的人多,进钱的道路全是死胡同,这穷日子,逼得人上天无路,入地无门。

两位老人像刀子剜心似的,把我的三个妹妹送给了人

家。有一个妹妹，死活不愿意离开，父亲不得不忍痛打了她几巴掌，才心酸地把她送走了。

那陣，我还有个弟弟，舅舅給荐到地主孙五家里扛长活，累死累活，卖着命地干了十年。由于长年劳累，吐了血，孙五見了，就一脚踢出了門。

这二十年来，家里的日子，好比“黃連树上掛苦胆——根苦梢也苦”呀！

这回两位老人見我回来，真是一行鼻涕一行泪。提起二十来年的伤心事，恨得把牙咬得“咯吱吱”地响。

母亲和父亲都劝我說：“別瞎跑了，庄稼人安分守己干点庄稼活比什么不强？”

我說：“不跑了，跑了这么些年，也該在家歇歇了。”嘴上这么說，心里早打准了“定盘星”。

长年累月在外奔跑，庄稼地里的活全攞生了，就跟姐夫学会了做醋。每天到四乡八鎮、大小村庄去做买卖，一轉就是一二十里地，我多想早些找到党啊！

一天，母亲說：“你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，也該成个家了。”

我說：“咱們上无片瓦遮身，下无站脚之地，誰家有閨女，也不往穷窟窿里塞呀！再說，咱們这‘清早飯晌午轉，后晌飯三更半’的日子，多一张嘴就多一份累贅，往后再說吧！”

可是，老人哪知道我的心，我是一个共产党员，为革命还没出什么力，这当儿，娶个媳妇，就算栓上了墜脚的石头，

那还行？

日久天长，听人说山里来了八路军，这是自己的队伍，心中暗自高兴。

一天清早，在村口外，见土坯墙和树上贴着八路军的传单、标语，心里亮了，知道队伍来过这里，知道山里确实来了自己人。

我就拿定了主意，上山找党去。

在临走前这天黑夜，我和母亲说：“娘，眼下日本鬼子打过来了，家里的日子也不大好过，我打算再到外边去活动活动。”

母亲说：“你在外边跑了大半辈子啦，还没跑够啊，回家来刚一年多又要走，娘还有几个亲人呀！”说罢，流下了泪。

我也很难过，一边安慰一边说：“娘，别难过了，咱们穷人的苦，是诉不完的。您想想，日本人占了咱东三省，眼下又要占咱华北这一片，咱们不能当亡国奴，不能受外国人的压制呀！”

母亲听了我的话，歇了半天，才抹着泪说：“儿呀，娘说不过你，常言说，尽忠就不能尽孝，你就走吧，只是日后别忘了给娘的坟头上添把土啊！”说着，又扑簌簌地落下了泪。

我安慰母亲睡了觉，自己躺在炕上，却瞪着眼睛到天明。

第二天，吃过早饭，拿了一把芍药花，提了两瓶醋，以走亲戚为名，又离开了家门。

遭敌手 喜遇亲人

踏过了拒馬河，刚刚走到半路，对面来了几个人，穿着打扮不像正式队伍，身上都带着“傢伙”。我們說了几句話，才知这是一股子土匪队，想勾引我跟他們踰渾水。

可是，当下他們人多，我要走，走不了。只好先随他們在一家老百姓家里住下，再想主意。他們暗中派了一个人盯着我。傍黑，那个盯梢的睡着了，我正出去解手，听門外有人說又过队伍了。我溜出門，跟一位老大爷打听，原来是八路軍，这下，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，可找到自己的队伍了。两条腿不由自主地朝队伍飞奔过去，拉着一个同志的手就問：“同志，你們是八路軍嗎？”

这个同志說：“是八路軍。”

我兴奋地說：“我要参加八路軍，跟哪个同志談呀？”

这时，过来一个人，說是队长，姓李。简单地問了我几句话，就随队伍到駐地住下，这才知道，这是一支游击队里的武装宣传队。

第二天，出发进山，到了游击司令部，見了一位王政委，我把出身經歷談了一遍。王政委很高兴，当即热心地給我安排住宿，把我留在部队里。

在部队的六七年，我担当过保管員、司务长、粮秣干事等工作。

一九四三年三四月間，我和一批同志，来到延安，党組織帮助我找証明，接上了党的关系。过去一起在法国的一

些老同志,又見了面。

过了两年多,我又由延安来到阜平工作。这年我已經五十多岁了,还是个老光棍,就由同志們帮忙,給介紹了个对象,不久就結了婚。

北京解放后,我又来到了长辛店机車厂。过去,就在鉄路上干活,如今又回到鉄路上来,和老工人們一見面,心里格外高兴。

我这一輩子,南来北往地跑了这些年,終于盼到了革命的胜利……。解放后的生活甜似蜜,想想从前的苦,尝尝今天的甜,真是一个地下,一个天上,干起活来,越干越起劲。

一九五八年退休以后,在家里閑着,心里不自在,手心也痒痒,曾一再向領導請求工作。本来嗎,我是一个共产党员,只要还有把子力气,就是提水、扫地、看門……,也要为党、为社会主义出把力呀!

(赵崇佑 整理)

走出地獄上天堂

全國勞動模範、工程師 陳 發

一九五九年，在國慶招待宴會上，我又一次見到了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。過去哪次都沒有這次離得近，我就在主席旁邊的一張桌上，看得可清楚啦。宴會開始後，周總理親到各桌祝酒，勸大家多喝兩杯。我哪，既沒顧到吃，也沒顧到喝，直看着毛主席。我這麼看着，心哪怦怦直跳，只覺着全身暖烘烘的。

直到宴會結束，看着主席紅光滿面的笑容，和走出去的穩健的步子，我在心裡默念着說：“毛主席這麼健壯，真是全國人民的大福哇！”

那天晚上，我回家後，很晚還睡不着。我想起了過去的苦日子，想起那比地獄還要黑暗的舊社會。今天，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咱們翻了身，當了國家的主人；可是在舊社會，咱們連牛馬都不如啊！

我要把過去的苦寫到紙上，讓年青的一代永遠不要忘記！只有不忘過去的苦，才能知道今日的甜。

受苦的路

我爷爷活着时，我們有过六七亩地，也有过几間房，那是我爷爷苦熬苦曳了一辈子挣下的一点产业。后来，由于人口增多，年景不济，再加上地主剝削，眼看混不下去了，爷爷才把房子卖了出去。原来准备过几年再贖回来，沒想几年后，光景越来越坏，不久，爷爷就被折磨死了。

爷爷死后，日子更过不下去了，那几亩地就連活契给人家了。为了生活，我媽去八里多远的南口車站做活，給工厂里的工人們洗衣服、补袜子。

記得那时，我常跟着姐姐去拣白菜帮，她抱着小弟弟，滿村找奶吃。弟弟餓得老是哭，有那孀子、大娘的看着可怜，就接过去喂几嘴。每天后半晌，太阳还高着呢，我們就来到村头上。西北风呼呼刮着，弟弟不住声地哭，我和姐姐不停地掉泪，几对小眼不錯眼珠地望着前面这条大道。眼瞅着太阳慢慢落下去，又左等右盼，才等来了媽媽。我們叫着跑上去，讓媽抱着，痛快地哭了一頓。

那时爸爸也在外边給人做短工，哥哥給人放牲口。每到晚上，一家人回到小屋里，冷冷清清的，弟弟沒奶吃，还是一声声干号。

后来，媽托車站上的工人，給爸爸找了个事，进厂当了名小工。那时，你越是穷，当头儿的越是瞧不起你；你越老实，他越欺負你。我父亲虽說上了点岁数，有那抬不动搬不起的，也挣扎着干。可是还不行，当头儿的净找碴儿，把那

最重的活派給爸爸，累他个半死不算，还三天两头罰他。有人就劝爸爸脑筋活动点，給工头送点礼。父亲說：“拿什么送，他不是要我的礼，是要我的命啊！”他这口气咽不下去，加上活又累，再也頂不住了。時間不长就一病不起，与世长辞了。这真像拆了擎天柱，剩下我們孤儿寡母的，怎么过呀？

一場大禍

二十岁上，我进南口工厂，当了个小工。地面上，有个叫程三麻子的，是个恶霸土匪，領着手下的三几十号人，专门坑害老百姓。日本鬼子来了以后，他搖身一变，成了什么“剿匪司令”。不知为什么，找尋起我們家，硬說我老兄弟“通匪”，把人抓了去，吊起来就打。逼着我們卖了七亩多地，把新卖的馬駒子搭上，又挨了点錢，才把兄弟贖回来。这一鬧騰，我哥哥又气又急，一下病倒在炕上了。

誰知一波沒平，一波又起。日本鬼子又找尋起我来，說我去贖人是“縱匪”。那天，我正在路上走着，来了几个日本兵，由一个汉奸領着，什么也不問，七手八脚就把我捆了，連推帶搯押到了宪兵队。接着过堂审問，硬要扣我一个“私通八路”的“罪名”。問来問去問不出名堂，就把我关到一个小屋里，看了起来。沒几天，这事全厂都知道了，伙友們联合了大部分工人，推举了几个代表，出面保我。这工夫，我們村也联名写了保票。后来，日本人怕把事鬧大，关押了一个多星期，就把我放了。

回到家，我赶紧去瞧哥哥，进门一看，咳，人早不是模样了。他见了我，还没说话就掉了泪。自从我被抓去后，他的病一天不如一天，说话声都变了。他小声说：“咳——这个家，以后还怎么过啊……”我说：“不提那些，咱们不是已经过来了吗？你把心往宽里想，咱们紧着治。”话虽这么说，我心里明白，我去哪儿请先生，拿什么治呀？“咳——治也没用……”他说不下去了，我鼻子一酸，也说不出话了，嫂子和几个孩子直哭，我赶紧把他们喊到外边，安慰几句，就出门想辙去了。那年月，穷人有什么辙可想，可怜我那哥哥，没等我请来先生，就死了。好端端的一个家呀，一下子被弄成这样。这祸是从天上掉下的吗？不是。这是日本鬼子祸害咱们。这仇，我永远也忘不了啊！

报 仇 解 恨

在厂里干活，三天两头不讓回家，白天干一天，晚上还得干多半宿，稍微一打愣，日本监工就揍你。他们整天喊：“快快的，快快的。”过来就是两脚。

吃的是小黑窝头，这东西是带毛的混合面做的，每人一个，算是一顿饭。有时给吃带砂子的高粱米，每人一勺。开饭时，人们都蹲在几条木板旁边，那勺饭就扣在这木板上，让你用手抓着吃。

工友们谁家过得下去呀？有的就想法往家带点东西。好，他们在门口大搜查，连袜子都让你脱喽。有个伙友拿了几块电石，被搜出来了，怎么办呢？讓叨着！电石那东西，見

水就生瓦斯气儿，有一点儿人闻着都憋得喘不过气来，何况在鼻子底下？再有，那东西冒气时烫啊，嘴皮一挨上还不烫一层皮？这种罪让人怎么受啊！人在这受罪，他却看着哈哈大笑。你说，这叫人多气。他根本没拿你当人哪！

大伙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编法儿不给他干活。你不是让“快快的”吗？行，咱们给你来个“快快的”。你看着时，我擦擦油泥就装上；你走了，我连油泥都不擦，装上去。有一回刚拆下来一个大勾具（汽缸里的活塞），上边拆了一道涨圈，日本人催得很紧，我把心一横，装上去，管他哪！找到头上来说。查不出来，车走到半道停车堵塞了干线，那算我闹着了。这样事，我们干了好多次，每次干完，几个伙友一唛叨，谁都咧开嘴直笑。咳，那年月，咱们穷人伤心事太多，一年也难得笑上几回呀！

慢慢地，我们就听说八路军下来了。我有个叫胡长福的亲戚，那天跟我说：八路已经到了他们村。这消息一传开，真像久旱的小苗见了雨，人们立刻就精神起来了。

那天，我们正干着活，胡长福见旁边没人，小声跟我说：“上回，日本鬼子说你私通八路，弄得你差点掉脑袋，这事你该记住了吧？”

我说：“那怎么能忘，我哥哥还不是为那死的。”

“对，这仇咱们不能忘。”停了一会儿，他又慢慢接着说：“假如八路军真让你帮点忙，你敢不敢？”

我一听，这话里有话呀，我知道他早就跟八路军有联络，现在说这话，一定是有什么事要做，就说：“有什么要我

干的，你就直截了当地說吧。只要我干得了，只要能帮八路軍的忙，我掉脑袋也干！”

他見我說得很坚决，才告訴我說：“八路軍有些枪需要修理，就是沒有工具，如果能送一些去，那可就帮了大忙。”我心想，这可是好事，把枪修好就能打鬼子，这也等于我参加了打鬼子，也是个报仇解恨的办法呀！这样想过后，我就对他說：“干！”

我知道厂里有修枪的工具，早年张作霖打馮玉祥时，这里为馮玉祥修过枪砲。有的工友箱子底下就有，像盘簧用的专用工具什么的，沒費什么劲，就找了好几样。以后又做了几样，还弄了些銼刀、鋸条、鋤头什么的。怎么送呢？藏在身上往出带？那根本不行，大东西沒法带，就是小东西被翻出来，也得賠脑袋。我們想了个妥善办法：把东西埋在煤水車的煤里边，車上的司机、司炉都是咱們自己人。倒車出厂时，往道边上一扔，下班后背个筐去拾，搜点柴禾一盖，万无一失。胡长福歇工送东西去了，这里鬼子就問：“胡的，哪里去了？”我不慌不忙地說：“八路的，抓去啦！”鬼子一惊：“八路的……哪里的有？”我成心吓唬他：“八路的在村里、山上，大大的有。”这样一說，鬼子更毛了，好像八路就在眼前，吓得赶紧溜了。过了几天，胡长福回来了。鬼子一問，他也說八路大大的有，气得鬼子干瞪眼。

这以后，我們村也住了八路軍。我利用上下班的方便，給咱八路軍买过几双鞋，报告了一些南口的情况。由于家里住了八路軍，每次回去心里都觉着热呼呼的。我就想，咱

們有这么好的軍隊，還愁打不敗小日本兒？可不是嗎，說打個南口，一下就拿下來了。過了不多日子，日本就投降了。

大白臉“審案”

日本投降後，南口被國民黨接收了。這裡也跟其他地方一樣，物價一天三漲，生產亂七八糟，只要跟接收大員沾點親，帶點故，只要是國民黨黨員，就是一個大屁不懂，也能當官，拿大薪水。

那時，我們廠就有這麼一個傢伙，不知他算個國民黨的什麼委員，是個接收大員，一個人就占著一大間辦公室。這人吃得挺胖，可淨跑瞎道，身子很虛，滿臉晦氣，因此，人們背地裡都叫他“大白臉”。想不到，這個大白臉，跟我鬧了一場麻煩。

那是因為一個口為4小型機車，出廠以後過八達嶺山洞，噴汽燙壞了人。好，這事找上我了。其實那活是一個姓袁的天津人做的，可當頭兒的非說是我，並且傳下話來，說大白臉要我去。我心里想，你們說是誰就是誰嗎？是我又怎麼樣？走，看看去。二頭兒跟著我，就來到了大白臉的辦公室。

大白臉正坐在轉椅上，叉開著兩條腿抽煙，見我們來了，三角眼先白了我一眼。二頭兒報告他，幹活的找來了。他紋絲沒動，慢條斯理地對我說：“那個車——是你做的？”

“是。”我成心要看他把我怎麼辦。

“你知道不知道，機務段燙壞人啦！”隨著這一声大喊，

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，停了一会，见我不说话，就又训上了：“我们的工作，乃是关乎国计民生之大事，一旦疏忽，即有性命之忧。一旦死了人，你得吃官司！该赔钱的赔钱，该偿命的偿命！你懂吗？”说着又一拍桌子，脸上的横肉直动。见我不言语，就又问：“你做活使的什么工具？”

“榔头、扁铲、搬手。”

“做完活看了没有？”

“看了，谁都得看着干活。”

“汽缸里的钻头是谁的？嗯！”

“我是钳工，根本使不着钻头。”我见他不言语，心里想，你不问我，我可要问问你了。我说：“这个车，是什么时候烫的人？”

“不是刚两天吗？”

“车出厂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一个多月了。”

“使了一个多月没事儿，为什么偏偏到这时候有了毛病？如果汽缸里有钻头，那又怎么试的车呢？”

“是呀，那个……这个……是呀，试车回来你没拆开汽缸盖看看吗？”

“试车没事。我拆盖看什么？”

“……”这家伙抓耳挠腮，一句话答不上来，紧皱着眉头，三角眼更显着尖了。我心里好笑，让他扮演《宇宙锋》里的赵高一定合适，就这副嘴脸，不化妆都成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没词儿转题了，折腾了半天还不知



我見他不言語，心里想，你不問我，我可要問問你了。我說：“这个車，是什么时候燙的人？”

道我是誰。我告訴他叫什么以後，他又問二頭兒：“他干什么活？”

“鉗工，什么都干。”

“嗯，看來這事主要責任不屬於我廠。可是出了事兒，短不了我得去費番口舌。”見沒人理他，接着又說：“可有一樣，誰要給我捅了漏子，我可對他不客氣！懂嗎？回去吧。”就這樣，他給自己找了個台階，連吹帶唬，才算下來了。

我這是沒讓他唬住。那時，讓他唬一頓吃官司受苦的人，可就多去了。什麼是理呀，他說什麼就是什麼。哪兒講理去？

第一次作主修車

解放以後，我們廠仍然修這種 口分4 型大車頭。這東西是專跑南口至康莊一帶爬山坡用的。可是有一台，出廠後這座小山坡都爬不上去。機務段催着讓去人修，我就帶着徒弟去了。那兒有個技師，非讓照他的辦法修。咱看着不準是哪兒的毛病，可也不好說什麼。修吧，連修了兩三回，耽誤一天多，也沒修好。

第二天早晨，廠長室的一個工友找我來了：“廠長叫你去呢。”我說：“什麼事呀？”“沒說什麼事。”我可犯了嘀咕，找我什麼事呢？這個工友把我領到了驗收室，嗚！早來了一屋子人，機務段的，技術科的，工程師、驗收員，坐了一大圈兒。剛一進門，廠長就迎了過來：“陳師傅來啦，來，這兒坐。”他把我推到里边中間的一把椅子上坐下，接着就遞過

来一支烟。这位李厂长，我早见过，待人很和气，穿戴也平常，记得刚解放时，他跟大伙讲：“从今天起，这工厂是咱们的啦……”那么，今天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没等问，李厂长说话了：“陈师傅，今天早早儿把你请来，不为别的，是为咱们那台大 口 为 4，修了还不能用的，大伙都很急，听说你很有经验，咱们想让你作主，你看怎么好就怎么修。”听他这么讲，我心里只觉着热呼呼的。这是又碰见老八路了，咱怎么能不掏出真心来干呢？我就说：“我问过开车的，他们说走着时有时空转，好像是前后两节不是一个劲儿，这是错汽不对呀。”“那你就修错汽。”我说：“行，咱们试试。”说着，我就带着徒弟上了机务段。

到了车跟前，又让司机活动了一下车，把毛病看在了眼里，我们就干开了。旁边围了一大圈子人，七嘴八舌，短不了要议论几句。徒弟有点发毛，我就跟他讲：“沉住气，干咱们的，我也没想一下子准成，咱们试着来。”等把活干完，我就让司机加挂了两台大车头，我说：“跑跑试试，不行再修，好了算完。”好，这回小山坡没费劲就过去了。机务段的那位技师连说：“行了，行了，满好。”他说行了，我们就回去了。可是大伙围着不讓走，非让介绍经验不可。从这儿，落下了个“机车大夫”的名儿。这件事，我很久不能忘，想来想去，想通了一个道理，就是：“只要咱们把厂里的事看成是自己的事，照党的话去办，什么都能办好。”

这是我第一次当家作主的活，从这以后，一直照着这样干，越干越有劲。

一九五三年，南口機車車輛修理工厂改为南口機車車輛机械工厂，領導上根据需要，把我調到了长辛店機車車輛工厂。

乍一来，我被分配在機車車間伐动工段。当时大部分青年工人对有些技术不在行，錯汽不对成了大关键。跟领导同志研究以后，我就輪班带徒弟，跟大伙商量着，先克服了這個錯汽不对的大关键。以后，又有大軸发热、导从輪跑偏发热等关键，都在党的領導和大伙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。一九五八年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被提拔为工程师。調到車間技术室以后，党为了更好地發揮老工人的力量，特別指示几个技术人员帮助我。几年的工夫，我摘掉了文盲帽子，上了高小，学会了看图和一些技术理論，还当了市科学技术协会的委員。这都是党的培养、关怀的結果。

我的儿女們

調到长辛店后，我把老伴和两个女儿接了来。我没有儿子，要了兄弟的一个，給他娶了媳妇。留在家里种地。

这孩子叫士敏，从小待我亲，我和老伴呢，也格外疼他，想法讓他念了几年书。长大成人后，多少人来給說媳妇，我都不贊成，最后这个，是个山沟里的穷人家閨女，我說：“門当戶对了。”好，咱們要的就是这样的。当时还没解放，有人跟我說，他哥哥是八路軍。我說：“他干他的八路，我娶的是儿媳妇。”表面是这么說，其实有这一层我心里觉着更好。

我們搬到长辛店时，姪子跟我垫話儿，也想过些时候来，

我說：“好好種地，不要這山望着那山高。”沒想過了幾年，忽然給我來信，讓我給我找個事，也要搬來住。我一看不對味兒，立刻寫了回信：“你不要聽別人的，要聽黨的話。現在在哪儿干都好，在農業尤其好。如果種地的光想自己一家子團圓，要出來；沒人種地，工人就沒糧食吃，國家好不了，大伙都好不了……”後來我見他來信，還是有些沒搞通，很不放心，就去了趟。進門一看，從院里到屋里，從吃食到穿戴，哪儿都說得過去。我說：“我像你這二十多歲的時候，哪見過這樣好的被褥？那時咱家的被子，棉花套破得都一塊一塊的……，你們都是窮人家的孩子，現在有吃有穿，可不能忘了從前的苦，凡事要往遠處看，毛主席說農業是基礎，你們按毛主席的話干，越干越有出息。”兩口子這才鐵了心，表示一定不再想別的，把農業生產搞好。現在搞通了，干得滿好。

我的大女兒景珍，一九五八年進廠當了鉋床工，干活不挑不揀，一向聽話。女婿是個黨員，也是個新工人。結婚時，我們商量着，一切從簡，誰也沒驚動，趕上廠里任務緊，誰也沒請假，就把事辦了。他們已有了兩個孩子，跟我住在一起，很和美的。

小女兒景琴，現在正在北京財貿學校念書，加入了共青團。這孩子自小沒受過苦，看問題常有時不着邊際。有天回來跟我說：“聽同學說，趕明兒我們畢了業，說不定是去當售貨員，那才沒出息哪！”我一聽，不對，就問她：“當售貨員有什麼不好？”她不言語，我又接着說：“剛念了兩天書，

就挑肥拣瘦，光想自个儿，不想国家，那才是没出息呢！你爸爸就是当小工出身的，这么說，你也一定看不起嘍？”她忙辯白說：“我不是那意思。”說着就要哭，她知道自己不对，談了一会儿，搞通了。

我常这样想：对待这些年青人，也得像对待火車头一样，得看他跑得正不正，听听有没有杂音？还得經常給他們唸叨着点，也就是經常得加煤、上水，浇点油。这样，他才不会出什么故障。

一步一步上天堂

前些日子，党总支李書記把我找去了，車間陈主任也在那儿。李書記笑嘻嘻地跟我說：“陈师傅，咱們来商量个事儿。”等我坐下，他又說：“您哪，上了几岁年紀，以后，就不要跟小伙子們搭搭弄弄的了。平常試車，也不要去了。非去不可时，您給我們打个招呼，怎么样？”我說：“这不是限制我嗎？”“嗯 限制点好。”他坚持上了。陈主任也說：“这也不难嘛，跟往常一样，处理問題，指点干活，只是別插手，不就得了嗎？”

我乍一听这“上了几岁年紀”几个字，一下子愣住了。我觉着这些年来，学文化、钻技术，干什么都那么新鮮。这心气儿呀，真像是小伙子刚出学校門，又像是进厂来刚干了一阵子，刚觉有了一些門道，还没撒开干呢！可这时候，上岁数了！亏了他們沒說出别的来，不然，我是真接受不了。李書記的意思，我完全清楚，他們是怕累着我，以前就說过好

几次，說我不爱惜身体。好，这回一定这么做，六十四岁，絕不算老，滿可以出出主意，大干一陣。

我常想，那旧社会就是地獄，咱們活着的人得救了，現在就得往前看，往远处看，毛主席早給咱們指出了阳关大道，咱們是在一步一步走上天堂啊！

（郭若楷 整理。张培力 插图）

苦海深仇

貨車車間木工、生產組長 杜光普

父親的死

我出生在一个貧苦的农民家里，父亲叫杜祥。在我們村附近，差不多全知道他是个老实人，从来不多說多道的。因为我家房无一間、地无一壠，父亲一年到头到处打短工，做杂活，天天手脚不閑，可还是养不活我們这几张嘴。

我十岁的那年冬天，家中沒有隔宿粮，一家全靠弄点地头散落的白薯叶、烂菜头糊口。天天吃这些东西，全家人都是面黄肌瘦，走起路来晃晃悠悠。这年冬天，老天爷好像也跟我们作对似的，气候比往年冷得多。眼看这个冬天熬不过去了，父亲就托人上房山县西边长沟塔小煤窑找背煤的活干。这地方人多窑少，老板为了賺大錢，就花小錢僱人，采取“放賬錢”的方法。誰家要过不了年，熬不过冬，去他那里借点錢，就得从冬天給他們一直干到第二年五月十三祭窑神为止。父亲来到小煤窑，老板見他面黄肌瘦，一身皮包骨头，就說：“不行，我这儿用不开这么多人。”父亲对他說：“掌柜的，你就留下吧。眼下就过年了，家中大的小的，

还没穿上棉衣呢！再说这年关也过不去啊！”在父亲的要求下，老板说要有保人才行。父亲就找了同村人做了保，老板才把父亲留下，工钱三成少一成，这明摆着是先刮一层皮。

干活的小土窑，是平地上挖的洞，煤窑口小得只能一个人爬上爬下。虽然是冬天，在窑里干活浑身上下不挂一条布丝，热气闷得人喘不过气来。可出了窑，西北风一刮，浑身上下像针扎那样疼。父亲去煤窑时，按照跑窑人的规定，应该带矿灯、矿帽和刮汗板，还有一个屁股帘。可是煤窑老板什么也不管，全得自己预备，家中没有，父亲只得借，凑合着下了窑。

起初，父亲是往上背煤，说是背煤，实际上是拉煤。绳子缩个圈儿，套在背上，骑上一股，后面拖着筐，手脚沾地往上爬。地势陡，每拉上一筐，人就像瘫了似的。

父亲是吃“放账钱”的工人，老板每天只知道要煤，别的全不管。不干完老板规定的活，就说你是踉跄滑蹭，这一天的活就算白干了。再厉害一点，老板就找保人说话，因为契约上规定：“如不安分守己，完不成活计，不管劳日多少，老板有权一笔勾销，保人负责追回放账钱。”

父亲就这样像牛马一样在地狱里熬过了一个冬天。来年春天，父亲在窑里干了“拉带筐”的炮子手。一次，炮刚点燃，还没来得及躲呢，因为炮捻短，火急，炮响了。随着响声，煤滚下来，打在父亲的右腿上，父亲摔倒了。窑中的工人，连忙把父亲背上来。老板看到父亲腿被砸成这样，不但不

同情，反而把父亲給辞了。

父亲带伤回了家，因为沒錢医治，家中大小又要吃要穿，在床上躺了六七天，就連气帶病地急死了。

餓死了弟弟、妹妹

为了料理父亲的后事，母亲帶着我和七岁的弟弟小夸，到父亲的朋友家去叩头报丧。东拉西借，湊合着奔了一口棺材，找同村的人帮忙給埋了。說是棺材，还不如那几块木板釘的“狗碰头”呢！过了不久，母亲把家中所能卖的东西全卖了，还了賬，剩下不多，买了点杂粮，搭上我和弟弟拾野菜，母亲給人家縫縫补补，湊合着混日子。

母亲由于伤心和劳累，加上日子过不了，天天发愁，沒几天，就病倒了。母亲这一病，奶断了，小妹妹就活活餓死了。

妹妹的死，更加重了母亲的病，一連几天昏睡不醒，家中的生活担子就落在我身上了。沒办法，我只好叫小夸看着小三，我挨着門去討飯。人們說：“要飯也得看准時間，也得会找門。”可我去要飯，不是錯過了時間，就是錯投了門戶。村中有錢人家，全养着狗，看我衣服破烂，扑上来就咬。就是沒养狗的人家，看上去也比我們强不了多少，我走上門又喊不出口，人家也不知我是干什么的。偶尔遇到个善心的奶奶，也只是說：“孩子，上別家要吧，我們还顧不了自己呢。”就这样，白轉了一天，沒要到一点吃的回来。沒办法，只好在地里弄点野菜，捋点树叶拿回家去，哄哄弟弟。

弟弟一見又是這些個，就哭着喊着說：“我不吃這個，我不吃這個……”不懂事的弟弟這樣鬧，母親在炕上唉聲嘆氣，我的心全碎了，可我又有什麼辦法呢？

村上有個要飯的瞎子，我們叫他劉大爺，他聽說我家這樣，就跟母親商量說：“三他媽，叫孩子跟我去要飯吧。”媽媽答應了，我就跟着劉大爺去要飯，一老一小、一瞎一明的，去到各村。往往轉了一天，也要不來一點能吃的東西。就是要了一點，我也捨不得吃，得留給媽媽、弟弟。當我每次回到家里，弟弟就搬着我那個破罐子看。有時有一點吃的，他不管餓不餓，拿起來就吃。有時我一點也沒要來，他看到罐子空空的，就哭了起來。每當這時我特別難受，又怕母親着急，不敢哭出聲，只好暗地里掉淚。

弟弟小三因為常挨餓，臉黃得像蠟似的，沒有一點血色，沒多久就死了。

不到一年，家里死了三口，這怎麼不叫我們傷心啊！

母子分離

父親生病的時候，姥姥曾經來過幾次。舅舅有心接母親和我們回家住幾天，可姥姥家也是上頓不接下頓呀！一去就是三口，怎麼行呢？母親沒有答應。

後來母親的病好了一點，強打着精神起來，到門口晒晒太陽。有的街坊就說：“不如叫孩子找個地方放牛去，放牛總比要着吃強點吧。”

這天，母親把我和弟弟叫到跟前說：“孩子，你們也不

小了，也知道日子不好过。我看咱们还是自找出路吧。”没说完，就哭起来，我们见母亲哭得这样，也哭了。母亲对我说：“你大了，什么也懂了，我看就去给人家放牛吧。我去给人家当老妈子，叫小夸在家里要着吃吧。能要一口就吃一口，等几年长大了，也去给人家当小做活的去。”

弟弟一听我们全走，不管他了，说什么也不答应。可母亲也没办法，还是忍心把他丢下了。

就这样，我们母子分离了。母亲去北京当老妈子，我给孙财主家去放牛，弟弟流落家乡到处讨饭。

在地主家，我白天去放牛、放猪、打草、扫院子，什么活全干。晚上，就和牛睡在一起。每天早上，天刚亮，地主婆就把我叫起来，说：“起来吧，趁着早上草鲜亮，赶快放牛去吧！”赶我起来，什么也不给吃，就叫赶牛出去，一出门还说：“带着筐，打点草来，晚上好喂！”

吃的更不用提了，地主婆喂鸡、喂猪，全是粮食。可我吃的，比我要饭时还差。地主婆还说：“给鸡吃点粮食，还能下蛋；给猪粮食吃，过年时还能宰肉呢！给你粮食吃有什么用？我们家又不养活闲人！”难道我是闲人吗？每当我听到地主婆这么骂时，就想起母亲和弟弟来。妈呀！你要是看到我这样，该怎么想呢？

受累受苦、受气挨骂的日子，我实在忍受不了，就偷偷地跑出来了。奔哪儿去呢？去找母亲，不知母亲在什么地方；去找弟弟，又上哪儿去找呢？只得又要起饭来。后来跑到卢沟桥，看到父亲的一个姓韩的朋友，把我介绍到一家饭

館里当小打杂的。一天，有人从良乡来，对我說：“你怎么不看看你弟弟去，他在良乡要飯呢。”我多想看看弟弟呀！老板是不准我去的。我偷偷跟掌灶的說了一声，就去良乡看弟弟。当我找到良乡，在街上看到他时，我俩誰也不認識誰了。弟弟本来就瘦，个子又矮，可現在更瘦更矮了。他披着破麻包，身上裹着洋灰紙袋，两只手和脚划了一道一道的血印。当我叫他“小夸”时，他惊愣地看着我，后来好像認出来似的，一头投在我怀里，就一边哭一边喊：“哥哥！哥哥！”弟弟哭着要跟我去，又要去找媽媽。我对他說：“小夸，你就先在这儿吧，我找媽媽去，就是死，也死在一起。”

后来，人家把媽媽辞了。我就从良乡把弟弟找回来，又把媽媽接回到那个村，借了一間房，湊合住下。分別了三年多，总算又团圆了。

当 試 用 工

回到家中，生活还是沒有着落。这时我十八岁，弟弟十五岁，就是出去打短工、干杂活，也能掙上一口半口的来养活母亲了。

我把弟弟送到本村地主家去放牛，我到外村去打短工。后来就跟本村一个老木匠当帮手，一方面学点木工手艺，一方面掙点錢。母亲又在村里帮助人家縫縫补补、湊湊合合混了近六年。

一九四六年八月，听說长辛店铁路工厂招人。我心里想，去工厂做工倒不錯，在工厂干活有准地方，省得东跑西

顛，再說到月頭開支，家中也方便。跟我母親一商量，她答應了。記得那次，我們一共考上了五十二個人，全分配到客車場當木工。

工廠算進來了，可剛進廠的頭一天，就挨了一悶棍，管事人說：“你們這些工人，是試用工，試工三個月，干好了就留下；不好就走人。”

我也不知道什麼叫試用工，後來一打聽，才吃了一驚。好厲害呀！三個月萬一他要找你個碴，說你不行，就算吹了。

在工廠當試用工時，開始我們真是低頭干活，到月頭一開支，我們一合計，一天還沒掙三斤棒子面錢呢！一下就轟動開了，大伙七嘴八舌地說：

“就他媽這一壺醋錢，怎麼養家呀！”

“照這樣干，非把媳婦賠出去不可！”

“有媳婦的賠出去，沒媳婦的怎麼辦？”

“看起來這洋工，吃不吃沒多大勁！”

說什麼的都有，年紀比較大點的，就勸大家說：“湊合着干吧，咱來時人家就說了，工錢比正式工人少點，這不是比他們老搭當的少不了多少嗎？”

“錢是不少，可頂屁用！”

“是呀！物價這麼漲，錢都毛了。”

嚷嚷了一陣，总算平靜下來了。可往後我們干活不那麼干了，吃不飽，哪來的勁？

有的老工人說：“這幫子揪着飛機尾巴來的接收大員，狗屁不懂，就知道往自己腰包里攬，給他們好好干活才是不

长眼呢！”

有的老工人說：“这伙子，一个个全鑽到錢眼里去了，看到錢比他亲爹还亲！”

在老工人影响下，我們也慢慢認識到国民党这帮傢伙是什么人：干活也就稀稀松松了。

过了半年多，我們真涨了一回錢，平均涨了百分之三十。可还是沒換长牌，錢是涨了，可物价比我們的工錢涨得还厉害。一开支，什么法币、美金呀，装了一口袋，可买回的粮食还沒錢放在口袋里多呢！当时流传着这么一段話：

工人工錢用袋装，
一到开支心就慌。
开支开了一面袋，
提着錢袋去买粮，
早去一会能装满，
晚去一会半袋粮……

老工人全这样苦，我們这試用工还提得上嗎？后来我們一上班，就把斧子放在手底下，弄一块木头放在旁边。看到监工的和主任来了，就順手砍两斧子；他們走了，我們就仨一群、俩一伙地聊大天。

当时，我們客車場主任姓彭。这个傢伙，长得个儿不高，小脑袋，挺瘦。他走起路来，两手往后一背，脑袋一低，眼皮不抬，一天到晚像沒睡醒似的。工人們說，他是个見煮鯨鯨

都不乐的傢伙。別看他走起路來沒勁，眼皮全不挑，可到車間蹣跚時，眼睛才會盯人呢。誰要是不干活，他站在老遠就看見了，回來就給你記上，扣你的工錢。

這一天，我們有十來個人，在車上正呆着呢。正聊着我們這試用工不改長牌，沒法子過的事。

有的說：“咱們何必在這受罪呢？非在這一棵樹上吊死么？不行咱們就溜之大吉！”

有的說：“那時他們為了裝門面，處處招人，現在是天天刷人。”

“這真是懷里抱着個刺猯，扔了捨不得，抱着真扎人！”

話沒說完，姓彭的一腿邁進車里來了。當時我們知道，躲也來不及了，索性就不躲了。看到他走上車來，我們圍上去問他：“彭主任，我們還改不改長牌？”

他看我們全圍上去了，又是異口同聲地問，知道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，忙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改，改，咱們已經報上去了，可是——局里還沒批回來。”

“那我們吃不飽怎麼辦？”

“我們現在全養不了家了！”

“再不給我們漲錢，改長牌，我們就不干了！”

我們十幾個人一嚷嚷，又招來了三十多人，全是我們一塊進廠來的。有的人一邊說着，一邊舉起了斧子，這下可把姓彭的嚇壞了。大伙兒你一句、我一句的，把他問得啞口無言，吓得他汗珠子一個勁往外冒。這時，監工的來了。他連拉帶扯地把大伙兒拉開說：“大伙兒別這樣，彭主任也知道大伙



看到他走上車來，我們圍上去問他：“彭主任，我們還改不改長牌？”

的难处,可他也做不了主,我看叫彭主任跟厂长说说。再答复大伙好不好?”

姓彭的一看来救驾的,就顺着嘴说:“对,对,我回头跟厂长说说,一定给大伙改长牌,涨工钱。”说着就溜了。

第二天,监工的来找我:“你怎么也跟着闹事?”

我说:“吃不饱,养不了家,怎么办?”

他说:“你们不怕开除么?”

我说:“开除就开除,腿长在我身上,叫走就走!”

他又说:“喝!你这年纪轻轻的,什么都不怕了?”

我说:“怕什么?反正肚子填不满!”

他又问:“你们这事,是谁带头?”

我说:“谁也没有,要说带头的,就是这肠和肚子。”

监工的看从我这儿打听不出什么来,就走了。

到第三天,工厂就把我们“额外”了。我们一起来的五十二个人,一下子“额外”了五十一个。前前后后,我在厂里干了将近一年。

抓 兵

离开了工厂,没地方去。我想,实在找不到活,就去打短工,要不就找几件家伙,给人家修理傢具什么的,反正不能在家呆着。可谁知回家没呆三天,乡长徐永顺就找上门来了。我知道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,没安好心,说不定又有什么祸要落到我身上了。他说,叫我抽签当兵去。

叫我当兵去?哼!我知道徐永顺看我刚刚离开工厂,没

地方去，就来趁火打劫。当时我想跑，远远离开这儿。可一想，不行，现在如露出声色，万一叫徐永顺看出来，他会当场把我给扣起来。于是我就假装答应他了。母亲听到这事以后，像一盆凉水泼在身上，吓了一大跳。我跟妈说：“您不用担心，到时候再说。”

晚上，我去乡公所抽签。心想，抽不上再说；抽上我就跑。谁知一下子抽了个第三名，前两名全病得起不来，我知道这是徐永顺下好了圈套。他在旁边一个劲地哼哼，乡丁拿着枪在外面死盯着我。于是，我把竹签往桌上一放说：“好！咱是第三名，既然有我，我就去，咱回家等着去。”

徐永顺两手一拦，挡着我说：“不！不！就在乡公所等着吧。”

“怎么？乡长，我既然来了，早就豁出去了，我准去就是了，回去拿双鞋总行吧？”

他犹豫了一下说：“行，我相信你，不过，咱可说开了，你可别敬酒不吃，吃罚酒啊！”

“行，我记着你对我的好处就是了。”说着我出了门。心想：去你妈的吧，我才不给你卖这份命哩！

回到家跟我母亲一说，顺着南墙根就跑了，一直跑到门头沟。后来听说，我跑了以后，徐永顺带两个乡丁抓我去了。到家一看没我，徐永顺说：“跑了，好小子！我这老猴子倒叫小猴算计了。哼！跑了老大，还有老二，去！把杜光月给我抓走！”

就这样，他们把我弟弟给抓去当兵了。

后来又听说，弟弟当兵没两个月，因受不了那份罪，开小差了。弟弟一跑，灾难就临到我母亲头上了。一天，我母亲正在给人家做活，忽然来了两个背枪的。把我母亲押到县里，当抵押了。到了县衙门，只问过一次，问什么，母亲全不知道，没办法，就押在牢里。第六天上，又提审母亲，问来问去还是问不出什么来，当官的就说：“现在放你回去，限三天把你儿子找回来，杜光月不在，叫他哥哥来，过期不来，等我们抓着他就枪毙他！”母亲只哼了两声，就回家了。

母亲回家没到三天，我们村就解放了。

共产党来了
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，我们家乡解放了，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穷苦人打倒了地主、土豪，我们过去在人间地狱里生活，现在一步登入人间天堂了。

解放后，我们家分了十五亩地，还有房子和一些东西。从解放那天起，我们才有了真正的家，再也不过那提心吊胆、东逃西跑、流离失所的日子了，再也不过那挨门乞讨、吃糠蘸菜、挨打受气的生活了。就从解放这天起，我才真正的开始过人的生活，国家主人的生活。解放不久，我弟弟就回来了，因为在旧社会受尽折磨，一九五一年就病死了。

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，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同年，我又重新回到了我们工厂，在货车车间当了生产小组长，大家还选我担任车间工会副主席。

现在我心里可高兴了，一家老小不愁吃，不愁穿，孩子

全上学了。母亲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，我再也没有什么发愁的了。我知道今天的日子是怎么来的，我知道今天的幸福是谁带来的。我要永远听党的话，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我的一生。

(齐振环 整理。毓继明 插图)

苦难三十年

鑄工車間煉鋼工、生产組長 卢增海

我的童年

我八岁那年，一个冬天的晚上，我和母亲守在屋里，等着父亲下班回家。汽笛一响，我挣着要去接父亲，母亲拦住了，因为我沒有鞋，脚已冻坏了。

父亲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一双小鞋儿，說是跟人家寻的。我有了鞋，高兴得了不得。

父亲接着唉声叹气地說：“孩子，爸爸养不起你啦，我求了厂里管事的，答应叫你在“洋房”（专供厂长、总管住的地方）里当个打杂的……”父亲颤抖地說完，母亲也伤心地流下眼泪。

第二天清早，父亲領我来到工厂西边一幢洋房里見了厂长、总管和先生。这些人个頂个吃得比猪还肥，走起路来要人搀扶。还有的，瘦得叫人害怕，全身蜡黄，两个大眼珠子快要掉下来。这里有几个小伙伴，都是专门伺候这些总管和先生的。

每到下午太阳快下山的时候，这些肥肥、瘦瘦的总管和先生們带着太太，打着旱伞，領着小孩，聚集在一个为他們专設的球場里，打球儿，玩乐。我們几个就給提水、拣球儿、买东西。就連总管小孩的鞋掉了，都得我們給拣。有时遇到不順心，挨打受罵是常有的。

我十岁那年，一次，大总管、二总管，还有工务段的几个人在一块打网球。这几个人肥的肥、胖的胖，都是一色的笨蛋，不会打球，拿着网拍瞎抡，不是接不着球，就是把球儿打飞了。害得我們一趟趟地拣球，累得通身是汗。忽然，嗖地一声，球儿打出場外，钻到椅子底下。上边坐的是譚总管的少爷，旁边坐的是他二姨太。我叫他起起屁股，他张嘴就罵人。我这气儿就不从一处来，心想：“我受你們大人的气，还受你的气？真他媽的有錢的王八大三輩了。”我猛地搬开椅子，一下子連他弄了个屁股朝天。二姨太一看，尖叫着就冲我打来。我往旁边一閃，她沒打着，更火了，嚷嚷着非叫譚总管打我一頓。我一看不好，撒丫子就跑了。第二天，我就被刷了。

鉄蹄之下

我十三岁上，又添了一个弟弟。从此就在街上作小买卖。“七七”事变后，日本鬼子看我年輕力壮，就用枪托把我的貨摊砸了，逼着我去当“苦力”。我在鬼子的刺刀逼迫下，給卸了一天汽油，一个錢儿沒給，我向他們要，一个日本翻譯說明天来才給呢。

我挨了一天餓想回家，走进一个胡同，不讓过！日本兵瞎嚷了几句，我也听不懂，还是往前走。站崗的日本兵追上来，就是两脚，又是一陣瞎嚷。我也不知怎么回事，扭头就往回走，刚走几步，前边的日本兵又截住了，围上来，又是一頓大皮靴，差点把我踢倒。正在这时，过来一个翻譯冲我說：“你給太軍鞠个躬就讓你过去了。”

我看了这个說中国話、披着日本皮的“中国人”，气得我拳头攥得嘎吱嘎吱响！真想掄圓了給他两脖拐，一时又想起了家里的老母亲，咬着牙給日本兵点了个头，心里一难受，回到家哭了半天。

第二天，母亲怕出事拦着我不叫去，我說服了母亲，又找到了那个翻譯。他給了两毛錢。

我說：“这两毛錢，連个窩头都买不了！”

他把小耗子眼一翻，說：“怎么，嫌少呀？”

我沒等他往下說，把錢往桌子上一摔，說：“不干了！”我扭头就往外走。

他把桌子狠狠一拍，說：“不干不行！給我押走！”几个拿枪的伪軍，連推带打地把我押到貨場，还逼着我干。我一边干，一边难受，心想：“这份亡国奴我不当！”我从貨場里找了一个鉄釘子，等把汽油桶装上汽車以后，偷偷地把盖儿撬开，汽車一开，汽油流得滿車滿街都是。我这才算出了这一肚子气。

一对苦命人

一九三八年，父亲当劳工去了包头。家里穷得没吃的，年底，母亲领着弟弟也去了。就留下我一个，帮人打短工，后来又在砖窑上干。过了两年，我也成了家。我爱人叫马芝敏，也是个苦命人，因老家遭了荒年，跟爹来到长辛店。她爹年轻时在厂里做工，后来岁数一大，厂里不要了。

成家后，增人进口不说，就在我爱人生下第一个孩子时，砖窑叫日本鬼子抢了。砖，盖了炮楼。人，撵散了。我幸运没给逮走，空手儿跑了回来。我把窑上被抢的事和爱人一说，她没说什么，搂着孩子直掉眼泪。

一天，两天，就靠借着吃。我不忍再让她去外边舍脸，一把拉着她说：“别借去了，还是我出去找点营生吧。”

她着急地说：“不行，外边没人修炮楼，紧着呢！我跟孩子他老爷说了，让他给托个人，能在厂子里找个事干就好了。”

我说：“不干！给日本人干活，我伺候不着！”

“你就别想这么多了，小日本呆不长。再说，你在家呆着，万一被抓走当了伙……”

“抓，我就跟他们拼！”

“依我说，要能进厂还是先进厂，挣钱多少的，凑合着先顾命，只要咱们人在，还怕有羊赶不到山上去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又小声地对我说：“听说，厂子里还有‘二七’时候的人呢！”

过了些日子,实在沒有别的办法可想,只好把家里破破烂烂的卖了,托人給工厂管事的送了礼,这才进了长辛店铁路工厂。

在工厂电炉上(炼鋼的一种炉子)当了六个月的試用工。忽然,收到母亲从包头寄来的信,說父亲死了,母亲和弟弟在包头要飯,要我去接。我脑袋轟的一下,就像天塌了下来……。

包 头 接 母

我心里火烧火燎的,不知如何是好,只好走进工厂,伙友们見我急成这样,都围了上来。我把父亲死的事一說,大伙也都很难过,又凑了錢,讓我去包头接母亲。一个伙友脫下他的破大衣,說:“把这个也帶上,包头那边冷。”

我感动得眼泪刷地流了下来……。

到了包头,就听风捲着沙子和雪,呼呼叫。冷得身上好像沒穿衣服一样,脸上像針扎、刀子削似的。走着,走着,我停住了脚,听見远处有人呼叫:“大爷爷,給一口吃的吧……”我听着像弟弟的声音,急忙跑了过去。一看,是两个人,我扑上去,抱着了母亲。等母亲認出我来,她再也站不住了,弟弟哭着直叫哥哥。我滿眼噙着泪水,扶起母亲,把破大衣給母亲披上。

母亲說:“孩子,你再晚来几天,就見不到你媽啦……”

我哭着說:“媽,您別难过了。”随手又摸出饽饽遞給弟弟。

这时，天黑了。我问母亲：“妈，有个落脚的地方吗？”

母亲说：“有是有，那个地方有好几天不敢去了。你爸爸没死时咱们就住在那儿。你爸爸病在炕上好几个月，家里分文不进，我每天出去要吃的去，没钱给房钱。”说到这里，母亲又哭起来，一会，颤抖着擦着泪，又接着说：“你爸爸来到包头，给日本人开矿，成天挨打受骂，吃不饱饭，又睡湿地，不到一年，大腿上长了一个大疮，怕日本鬼子看见活埋了，后来就去一家澡堂子当了伙计。一天，一个日本鬼子洗澡，叫他拿鞋板，你爹腿上的疮还没好俐落，走慢了点，鬼子就给了两个大嘴巴，你爹当时就昏了过去。别人给搀到家里，一连几天说不出话。头死的时候，他非要喝口香油，说他肚子里堵得慌。你爹哪是什么堵得慌啊！是肚子里没食，气儿截住了。你爹临死的时候，还念叨着你……”母亲说到这里又伤心地哭了。

“你爹死后的第二天早上，店老板连骂带喊地闯了来。几个住店的小买卖人，看我们母子可怜，掏出几个钱给了老板，老板才答应给了一张破炕席。就这样把你爹用席卷着埋了。”停了会儿，母亲又说，“以后，店老板天天来逼，还逼我嫁人。我想这地方是不能住了，就跟你弟弟偷偷离开了。打这以后，我们娘儿俩就天天在外边，东一家西一户地要饭，黑夜就找个庙舍儿住下……”

我听了这些，伤心极了。看了看母亲的脸色，干枯的，被风雪吹打得满是裂口。十二岁的弟弟连冻带饿，又瘦又小，

脸色发青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：“我跟他们拼了！”母亲一把拽住了我，说：“孩子，你别去找事儿了，咱们惹不起！”

“吃不饱，咱就泡”

腊月二十三那天，我把母亲接到家里。因为连冻带饿，母亲病了一个多月没起炕。

第五次“强化治安”后，根本见不到粮食。厂子里按人分给点豆饼、麻饼、豆皮儿化学面，生活越来越糟。当时，大米、白面、煤油等都成了军用品，日本人要看到谁家这些东西，就给按个“私通八路”的“罪名”，不打死，也难活下去。

穷人家到处去捋树叶、刮树皮，我们一家子吃槐树花子，吃得浑身浮肿，连炕也下不来。我的儿子快两岁了，饿得不会哭，连脑袋都抬不起来。到了四岁还不会走，邻居们都说他是个瘫子，其实是饿的！

厂子里的工人，谁也没心思干活。在我们电炉上就有这么一段“泡”歌儿：

吃不饱，咱就泡，
找个昏晃睡大觉，
甭看铜水出不多，
进口的材料没少耗！

日本鬼子拿“强化治安”统治我们，我们就用“泡”的方法对付他们！

为了打馬虎眼，我們还弄来一輛小推車，裝上些焦炭、溜子什么的，換着班推着滿場轉，日本鬼子一看，覺着我們还挺卖劲呢！那知我們早呆够了。后来听說石家庄那边粮食便宜，就开始跑买卖，天天早上七点半进厂，把牌儿一翻，八点就出厂了。到家里背好东西直奔火車站，等火車开过来，扒上去就走，不到天黑，換回点白薯、胡蘿卜、粮食什么的回来。到家放下东西，赶紧进厂把牌儿一翻，这样一点不露馬脚。

一天两天，日子一长，这个法子不灵了。以后就开始請假，一个月請三十天假，一連干了两个月。

車間有个事务員，他对工人們挺好，一天他跟我說：“老卢，你这买卖不能天天跑，跑两天，干两天，这样日本人覺不出来，要是天天跑，讓日本人知道了可够你餓。”我一听也对，第二天就上班了。

日本主任二健，一看我有好长时间沒上班了，瞪着两只牛眼嚷道：“你的，电炉的不要！”

我問：“讓我上哪去？”他說：“落沙的去！”我一听落沙，是夜班，回到家睡了会覺，啃了几口胡蘿卜，就来了。天一黑，我把风管子头儿綁在弹簧箱里，扭开节門，就听“嘩啦——嘩啦——”地响起来，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我在干活哪，天知道，我这早睡上啦！

到天快亮，我也睡足了，拿起风管子就乱吹一气，弄得車間滿是沙子。到点，把风管子一扔，連脸都不洗，就又上石家庄啦！

一回，出事了。那是腊月二十六，我用盐在望都换了粮食，打算过年吃顿净米净面。在望都车站上了车，被日本鬼子逮住了，把我们一群跑买卖的押进了保定监狱，一宿没给吃的。第二天大清早，每人挨了一顿扁担。押了一天一宿，粮食充了“公”，这才放了我們。

回到家一看，老婆、孩子哭成泪人儿，我母亲都快哭瞎了。就这样大年三十，我們一家弄了一锅胡萝卜煮了煮，算过了年。

无边的仇恨

一九四五年，日本鬼子投降了。厂子里，厂子外，不大的工夫，全都知道了。呆了一会，就听厂里“追呀！打呀！”的喊叫声，我跑过去一看，里边揍上啦。我啐了一口，骂道：“狗日的，欺侮我們八年了……”这话还没说完，就見从里边追出一个来，我顺手抄起一块劈柴棍子，“砰！”的一下，正打在他腰上，他没命地跑，我撒丫子就追！

机車場，有个无恶不作的日本主任，外号叫“紅鼻子”，大伙追得更厉害，直追得他从几丈高的小楼儿上跳下来，没蹿死，大伙儿又围上去，拳打脚踢，狠狠揍了一顿。

誰知赶走了日本鬼子，又来了国民党。真是前門走了豹子，后門进来狼。

这时市場的物价，一窩风儿地涨，工人开支用口袋往家扛，可就是买不着东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吃还顾不过来，哪还有錢买穿的呀？可是，在我們电炉上干活，别的都好說，沒

鞋穿可不行。我图了个便宜，在卖破烂的摊上，买了一双破皮鞋，誰知道，就为这个，还挨了一场冤枉打。

有一天，我一出門，正碰上有一个掛盒子枪的官儿，他是到“三多里”找破鞋娘儿們的。我一見这些官儿，气儿就来了，两手一揚，說：“找誰？沒事儿別瞎串！”他从上到下看了看我，知道我不好惹，碰了一鼻子灰，垂头丧气地走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他領着几个兵，气汹汹地直奔我們家，进門就問：“你們把那个逃兵藏在哪了？”我爱人說：“我們这哪有什么逃兵呀？”那官儿发火了：“混蛋！沒有逃兵，你丈夫哪来的皮鞋呀？”

不一会，我到家一看，正是昨天那个小子。他一把揪着我的脖領說：“你把那个逃兵藏在哪了？”我說：“根本沒見着什么逃兵！”

話音刚落，这小子一揚手，打了我两嘴巴，說：“細走！”

这群生狼，連推帶拉地就把我押走了。到了他們师部，还是向我要人。我也沒給他好气儿：“不知道！”那小子喊了一声：“打！”只觉得皮带、棍子、枪把像冰雹似的打在我身上，疼得我倒下了。过了一阵子，又是一頓毒打，我昏过去了。等我醒来，看那小子一脚蹬在板凳上，帽子歪歪的，狠狠地抽了几口烟，喊道：“姓卢的，这回你可知道二爷的厉害啦！”随手把烟头往我脸上一摔，“放了他！”

回到家里，听說弟弟又被抓了兵。我抱头痛哭起来。心想：“这叫他媽的什么世道，父亲讓日本鬼子打死，母亲逼得要了飯，如今来了国民党，一家人給餓成这样不算，还誰

想打就打，这个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哇！”

共产党来了
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，长辛店解放了。

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，东方升起了红太阳，我背着半口袋小米从厂里出来，心里乐开了花，嘴里哼着小曲儿，走进了家门。

“妈！您看这是什么？”

我母亲、老婆、孩子都围了上来，我伸手从口袋里抓出一把金黄的小米，她们都看呆了。母亲嘴里嚷着“小米儿！”就下了炕。走近装小米的口袋，还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又用手揉了揉才说：“哎哟，这玩意儿十几年没见着哪……”话没说完，伸手捏了几粒放到嘴里，说：“好东西，好东西！且他爹，哪来这么多小米呀？”

我高兴地说：“这还算多呀，厂里放着一列车呢！都是解放军给咱们拉来的。他们说我们保护工厂、保护机器有功，每人奖励五十斤小米，以后，还要按人口把小米分给大家呢！……”

我一看她们听入了迷，母亲嘴里还含着小米，眼角里早滚下了热泪。母亲干枯的脸上，开始有了笑纹，老婆、孩子像久逢天旱得了一场饱雨似的，别提多高兴啦！我心里一高兴，又没头没尾地说起军事代表讲的话来：“咱们工人是工厂的主人，是国家的主人，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咱们翻了身，往后工厂就是咱们自己的啦！……”

“哟！”我猛地想起，“光顾说话了，差点忘了大事！”“什么事？”“修桥去！国民党这帮坏东西，把咱们糟踏够了，临跑还把卢沟桥炸坏了。”

浑身是劲

解放后的日子，一天比一天美。我弟弟卢增山，在国民党时候被抓了兵，不久也被解放了。后来，他成了包头钢铁公司的技术工人。有时，我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，心想：“我老卢在旧社会受了三十多年苦，如今成了工厂的主人，一家老老小小，有吃有住，过着好日子，这都是托共产党、毛主席的福啊！”想着想着我乐出了声。我老婆直推我说：“你不睡觉，黑更半夜乐什么呀？”

歇班的时候，在家里呆着别扭，心里总惦记着工厂。在厂里，车间领导们看见，总是卢师傅长、卢师傅短的称呼，碰到什么事，还找我们说道说道，让给出个主意。每逢遇到这些，我真受感动。心想：咱们有什么呀，论文化咱连自个的名字都不会写，论技术咱更不行，虽然在电炉上干了十几年，那阵咱们穷工人摸不着学。整天提心吊胆，不知哪炷香火烧不对，就得挨揍。每逢想起过去，看看现在，我身上就有使不完的劲，嘴里常叨咕着：“我这条命算交给党了，党叫我干啥，我就干啥！”

有一回，我也真发了愁。那年，车间领导组织我们学习业务，我也跟着报了名。

开课的第一天，就看见老师在黑板上划了几个圈儿不

像圈儿、弯儿不像弯的字，說这是什么化学元素符号，我一看就膩了，沒等下課我就顛了。

下課后，老师找到电炉上。我說：“不行，这圈儿、弯儿的，我一看脑袋就大了。”

老师說：“卢师傅，慢慢来，这也沒什么难的，您看那笔划多簡單呀！”

旁边站着刘广录也湊上来說：“老卢，学吧！这玩意儿除了圈儿和弯儿就沒戏了。你只要記着怎么划，唸什么就行。”他俩这一說，我脑子里还是嗡嗡响。

我說：“学这玩意儿，能多炼鋼嗎？”我这么一問可不要紧，逗得大伙儿都哈哈大笑起来。他們这一笑，我更急了，我說：“你們乐什么？”

旁边的几个小伙子笑着說：“卢师傅，咱們学这个就是为了多炼鋼啊！”

那个老师怕我还不懂，又說：“学这个不但能多炼鋼，还能避免废品，多炼好鋼哪！”

我一听这个，扔下傢伙就說：“我学定啦！只要能多炼鋼，再难我老卢也不怕。”

一九五一年，工厂生产不断发展，需要的鋼多，我們就千方百计想办法，多炼鋼，滿足生产上的需要。

時間不久，我又当了炼鋼工长，这时还没有炉前化驗。我学会了看“断面”后，又教会全班人看。这样一来，鋼的質量保住了。出鋼的炉数，也由原来每天出一炉，提高到两炉、三炉、四炉；炉盖的使用次数，也比以前增加很多。尽

管这样，我們并不滿足，还是不断地钻研、改进。

一九五三年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又当选为先进生产者、安全积极分子。現在我們这个电炉，炼鋼日产不是四炉、五炉，而是八炉、九炉，有时甚至达到十四炉、十五炉！

炉盖的使用次数，也远远超过規定的标准，比解放前提高了十几倍。

也許有人要問我：家里生活怎么样呀？我可以简单回答：跟我們工厂一样，生活一天比一天好，一年比一年高。要問提高了多少，我家天翻地复的变化，和解放前相比，真是一个地下，一个天上，怎能用数字說明？

(刘寿昌 整理)

父仇子恨

鑄工車間翻砂工 李茂林

四只手顧不上四張嘴

一九三六年，一个寒风腊月，滴水成冰，西北风卷着鹅毛雪的冬天。

一天早上，外边下着一尺米深的大雪，父亲穿着一件空心的破棉袄，用根草繩子把腰紧紧地一扎，又“出車”去了。

当时，家里有母亲、我和一个小弟弟，一家四口就靠着父亲拉洋車过活，常常拼着死命拉一天，也挣不上二斤棒子面，再刨去交“車份”的錢，全家只能開口粥喝。有时，父亲就給赵辛店一家槓房当当吹鼓手，扛扛长活，这家槓房还种着几十亩地。平地掘餅，現奔現吃，奔来点錢就吃，奔不来就把几根腸子閑起来。

一天，父亲快要收車的时候，对面来了一个人，头戴貂皮帽，身穿皮大氅，左手大皮包，右手文明棍，来到跟前要僱車。父亲打量了一下，这人个子虽不高，却是个肥里透圓的大胖子，父亲心里有些犹豫，倒不是怕拉不动，而是怕租来

的这辆車，拉空車时还“咔嚓、咔嚓”响，要拉这个大胖子，就許把車压散了。可是不拉又不成，只好硬着头皮，提心吊胆地攥着两根車把，像攥着两条蛇，大胖子在車上动一动，車就发出更大的“咔嚓”声，父亲的心也就更紧縮。天寒路滑，渾身打战，好不容易拉到地点，大胖子下了車罵了一句：“废物！”就揚长而去。父亲求他說：“大老爷，給俩錢吧，家里还有几张嘴呢。”大胖子理也不理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父亲只好忍气吞声地收了車，交不上“車份”，車主不干，父亲央告着說：“明天补吧。”

車主說：“差一天，明天补双份。”

回到家，父亲一进門就趴在炕上，母亲急忙走过来給他捶腰。过了一个时辰，父亲坐起来含着眼泪說：“分文沒掙，还得挨冻、受累、挨罵……”回过头又对我說：“小林子，这年头真不好混哪！往后我奔鍋上边的，你帮爹奔点鍋底下的吧……”

这一天，鍋盖又沒揭开，一家老小勒勒褲腰带睡了觉。夜里，四处非常靜，只有肚子里几条腸子，咕嗒咕嗒地叫着。

往后，暑往寒来，父亲还是到处去奔波。我冬天提个小籃去拣煤核，春夏两季就去打草，有时給本村地主家放个小猪。爷儿俩个一天到晚，頂着星星出去，披着月亮回来，还常落个吃了早晨的，沒有后晌的。

四只手顾不上四张嘴，那时我只有八九岁，肩膀上就压上了养家糊口的担子。

乱刀扎 老叔惨遭害

我十岁上，日本鬼子来了，奸淫烧杀抢，祸害老百姓，闹得鸡飞狗跳，人心不安。

我们村有个叫谢富的流氓，连拍带舔，当上了苦力头儿，整天替日本人效劳，抓壮丁。

一回，日本人想找个赶大车的，抓来派去就找到我老叔头上。我老叔是个做小买卖的，干不了，谢富这小子狗脸一翻，绿豆眼一瞪，说了声：“不去，叫你在枪下做鬼！”说着，用手拍了拍腰里的“盒子枪”，吓得老叔心里直扑通，只好点了头。

可是，谢富这小子把日本人一辆大车，偷偷地赶跑了。日本人知道了，气得哇哇怪叫，逼着我老叔去找人。可是，谢富早跑了，日本人紧盯着我老叔找了几天，找不到，就下了毒手。这一天，鬼子拿了一把尺来长的尖刀，对我老叔说：“谢的跑了，你们一伙的有，通通的心坏了的。”我老叔又气又哆嗦，鬼子一脚把我老叔踢倒，举刀就扎，一连扎了二三十刀，直到我老叔一动也不动了，才住了手。

我老叔被扎惨死，村里的日本走狗又说我父亲也不是善民，也得抓起来拷问。我父亲听见这个信，不敢在家多呆，就逃跑了。

母子俩 讨饭门头沟

父亲走后，只剩下我们母子三人，家里穷得连根柴禾棍

都沒有，飯鍋吊起來當鐘敲。弟弟餓得面黃飢瘦，胳膊腿就像秫秸杆。母親一邊替父親擔心，一邊又怕狗腿子來抄家，整天捏着一把汗。俗語說：屋漏又逢連陰雨。果然不久，漢奸狗腿子又帶着鬼子來搶東西，吓得四五歲的弟弟直往母親懷裡鑽，受了一場驚吓，不到兩天工夫就死了。

母親抱着弟弟，哭得死去活來。那陣，不用說棺材，連塊破席頭都沒有，就光着屁股把他埋了。

家裡啥法也沒有，只好到外鄉去找活路。母子倆就一路走一路討飯，來到了門頭溝。

到了門頭溝，一無親戚，二沒朋友，白天挨門串戶去要飯；晚上，蹲在破廟門洞過夜，還要提防查夜的。不然，給抓去，又要遭殃。

過了幾天，聽說有個小煤窯招工，和母親一商量，母親看着我這瘦小的身子骨說：“下窯背煤是個力氣活，你這把骨頭架得住嗎？”我說：“怎麼也比餓死強啊！”母親只好點點頭。從這天起我就開始了下窯背煤的生活。

下窯背煤確實是個累活，一次要背四十來斤，一天要背十幾次。在煤井里，上上下下每天要爬二三十個來回，我那陣剛十二三歲，身子骨又單薄，身上只穿條襤褸的短褲，光着腳丫爬上爬下。干完一天活，只覺得胳膊發酸，腿發軟，脊梁背就像壓酥了一樣，累沒少受，汗沒少流，一天只掙一元三，可是買斤棒子面卻要花兩元五，死去活來地苦奔一天，還奔不出半斤棒子面的窩頭。

就這樣，在煤窯里，上來下去爬了四年多，誰料想，日久

天长，飢飽勞碌，得了胃病。穷人有病活受罪，不但沒錢治，还断了吃飯的活路。母亲只好去央求煤窑掌柜，先借几天的工錢治病，可是，掌柜的一搖晃肉头說：“我們窑上有言在先，摔死、累死与本柜无关。再說，三条腿的沒有，两条腿的有的是。”說完，一甩胳膊，把母亲轟了出来。

母亲回来，流着泪說：“林子，人穷路窄，外乡也不好混，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啊！”

过了几天，我的病有些好轉，只好和母亲离开門头沟，又回到了老家——赵辛店。

乡公所 母亲遭毒打

回来不久，一天晚上有人敲門，我开門一看是父亲，他进到屋里，一家三口見了面，也顧不得說話，就伤心地抱头痛哭起来。

这几年，父亲打听不到我和母亲的去向，只是四处游蕩，凭着力气混飯吃。

这回，一家三口又团聚在一起，虽然穷，也情願在一块喝西北风。

我們回来两三天，父亲看街面上没什么风吹草动，就試探去找点活做。这一天，父亲刚出去不久，伪乡长楊三枪領着一伙狗腿子，闖到我們家里，一个个手里拿着繩子棍棒，在屋里乱翻乱找了一陣。楊三枪厉声厉色地指着母亲問：“小林子他爹哪去啦？他偷了乡公所一个汽車轆轤，你們窩藏在哪儿啦？把汽車轆轤和小林子爹，一块交出来吧。”

母亲听了，出了一身冷汗，哭哭啼啼地央告说：“乡长，我們沒偷啊。”

楊三枪说：“好啊，还不認賬，这是軍用品，皇軍怪罪下来，你担得了嗎？不把东西和人交出来，反正跑了和尚跑不了庙。”他向狗腿子們一递眼色，说：“綁！”说着，狗腿子把我和母亲捆綁起来。

楊三枪还狠狠地說：“这叫父債子还，夫債妻还。”

狗腿子們拉拉扯扯的，把我們母子带到乡公所。楊三枪坐在靠背椅上，用手把桌子一拍說：“在这儿，可跟你們那两間狗窩不一样，說吧！汽車轆轤卖給誰啦，人窩藏到哪去啦？”

母亲說：“乡长老爷，我們……我們真沒偷啊！”

楊三枪嘿嘿一陣奸笑，說：“好哇，还敢嘴硬，讓你見識見識。”扭头对狗腿子們說，“先給她点‘小菜’尝尝。来呀，給我打！”

两个狗腿子就把母亲按倒在地，另一个抄起一条竹板，朝着母亲渾身上下，沒头沒腦地打来，板子像雨点一样落在母亲身上，只見母亲在地上滾来滾去，鮮血滿地。我看着母亲挨打受苦，拼命地哭着罵着，狗腿子們却死命堵住我的嘴。

正在这时，門被踢开，有人喊了一声：“楊三枪，留点德！”

我一看是父亲，猛地愣住了。

蹲監獄 父亲含冤屈

原来，父亲到外边找零活，回来听街坊說母亲被抓了去，便急急忙忙赶到乡公所，見母亲被打得遍体鱗伤，便挺

身指着楊三枪的鼻子說：“楊三枪，我和你沒冤沒仇，为什么下毒手拿一个妇道人撒气？”

楊三枪听了，一拍桌子說：“这是乡公所，这是衙門口。我是一乡之长，說話沒上沒下，你就不怕皇軍的国法！”

父亲說：“我沒犯法，你治不了罪。”

楊三枪說：“你說沒犯法，乡公所的汽車軋轆誰偷走的？”

人們都望着父亲，忽然，父亲大叫了一声：“是我偷的！”

母亲一听，忍了周身的伤痛，猛地一下欠起半个身子，两眼吃惊地看着父亲。

楊三枪听了，哈哈大笑，說：“好！是条硬汉子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骨头不軟！快說，怎么偷走的？”

父亲神色不动地說：“要問怎么偷的，得問你楊三枪。”

楊三枪一听，頓时一愣。

父亲接着說：“你是乡长，整天守在乡公所，汽車軋轆就在你手心里攥着，怎么偷走的，你心里明白。如今你反过手来冲我打黑枪，你卖给誰，入腰包多少錢，你自己报报賬吧。”

楊三枪听罢，脸色发青，两眼瞪得比鸡蛋还大，站起身来，攥着拳头把桌子敲得咚咚地响，牛吼一样地說：“你……你胡說，你……你滿嘴噴粪……”一边說，唾沫星子噴出老远。

父亲紧接着說：“楊三枪，自打你当上乡长，专门欺负老实人，踹寡如門，刨絕后坟，現今又沒凭沒証，把偷汽車軋轆的脏栽到我头上，你安的什么心，尽干坏事……”

楊三枪听了，气得肚子鼓鼓的。扭头向狗腿子說：“先把他关起来！”狗腿子便把父亲押了出去。母亲见了，哭哭啼啼地央求也不頂事。

接着就把我和母亲轟了出来，楊三枪又說了句：“別忘了，打个主意把人贖出来。快滾！”

母亲回来后，一心惦记着父亲，愁得沒有办法，后来，經中人說合，只有把祖輩留下的两間房的房契，押給楊三枪。誰知楊三枪看着房契，晃了晃脑袋，說：“哈哈，两間狗洞子能值多少銀子，这不是起哄嗎？”可他一边說着，一边把房契揣进衣袋里。

房契落到楊三枪手里，却始終不見父亲出来。不久，楊三枪手拿房契，把我們母子从房子里撵出来。

母亲說：“房子归了你，可人得放出来呀！”

楊三枪一陣冷笑地說：“想得好，小林子爹偷了汽車轆轤，皇軍大怒，早把他押到北京法院去了。”

父亲被誣告送到北京法院，过大堂、逼口供、受刑罰，无凭无証，法院也問不出个头緒来，就糊里糊涂地判了刑，蹲了半年的監獄。

風雪夜 逃奔石景山

母亲和我，被楊三枪逼得走投无路，听說石景山那地方，做工吃飯的路子多，一天夜晚，只好顛顛簸簸地向石景山奔去。

到了石景山，仍是两手空空，白天还是走街串巷、挨門

乞討混日子；晚上就睡在四面透风的窩棚里。身上无衣，肚內无食，冷得透不过气来，只好在路上撿些洋灰紙袋子，一层一层地裹在身上，寒风吹来，仍然是透心凉。

冬去夏来，一天，正在街上討飯，对面来了一个人，头发有三寸长，脸上又黑又瘦，走到我們跟前，猛地叫了一声：“林子！”我們母子一愣，仔細一看，原来是父亲。我們又高兴又难过。只离别才半年多，可是父亲被折磨得不像人样了。

宛平县 父子受苦刑

父亲回来后，正愁沒活干，这天，窩棚外边有人喊：“要飯的花子，无业的游民，願当苦力的跟我走，干一天掙一斤棒子面……”父亲一听，說：“小林子，走，咱爷俩全去，可別放了空，过了这个村就沒这个店了。”

父亲和我出了窩棚，只見外边站着一个人，帶着一副墨鏡。父亲和他一說，他滿口答应，馬上就跟他走了。晚上，他帶領着我們一伙人，走出老远，走进一座大房子里，里面的东西滿滿当当，也不知是什么地方，他就指揮着我們往外搬运焊錫、鋼筋……，嘴里还一个劲地說：“快！快！”我們就一趟又一趟地往門外的汽車上装。刚刚装上一半，就听四周围有脚步声。接着，又听见一陣大枪拉栓的声音，随后有人問：“干什么的？”大伙一听都傻了眼。只見，黑压压的一群人，手托大枪，围了上来。不多时，把我們一个个拴好，帶到北辛安拘留所，拘留了两天，又押解到宛平县。

到宛平县，过堂开审，二十来个人往堂上一站，法官戴着一副墨鏡，神气十足地問：“你們这伙穷老花子，为什么偷盗仓库的东西？”

听说“偷盗”，大家心里憋了一肚的气，觉着十分委屈，就异口同声地說：“偷东西？我們不知道，这是有人领着我們干的。”

法官又問：“領头的是誰？”

大家說：“是一个戴墨鏡的。”

法官一听，摸了摸鼻梁上架着的墨鏡，赶忙摘下，慌慌张张地說：“戴墨鏡的是誰？快站出来！”

大家見到法官的举动，想笑又不敢笑，有几个人从鼻眼里“嗤嗤”了几声。法官見没人搭話，反而有人嗤笑他，心里掛火，用手一拍桌子，就命令法警給我們上刑，法警拿着皮鞭，挨着个、輪着班地打，皮鞭抽下来，像带着一股冷风，颯地落在身上，鮮血染紅了大堂，有的人被打得昏迷了过去。打完，又把我們关进了牢房。

此后，又过了几堂，給我們过电，用烙鉄往身上烙，往鼻眼里灌辣椒水，也沒有逼出口供，只好又关起来。从这天起，一連好几天不給飯吃。大家受尽了折磨，加上水米不沾牙，站起身来，眼冒金星，有十来个人，就这样死在牢房里。一个多月后，法官見問不出什么，才不明不白地把我們放出来。



法官一听，摸了摸鼻梁上架着的墨鏡，赶忙摘下来，慌慌张张地说：“戴墨鏡的是誰？快站出来！”

抓劳工 再进活地獄

我和父亲回到石景山，找到了母亲。

第二天，父亲說：“还是上煤窑找碗飯吃吧。”我們一家三口，又离开石景山，二次来到了門头沟。

在門头沟住在一个小店里，刚刚在窑下背了一天煤，連一頓飽飯还没吃到嘴。夜里，日本兵把小店围得水洩不通，几个带枪的鬼子兵和警察，踹开店門冲了进来，把住店的人，一个个轟起，检查“良民証”，輪到我和父亲，什么証也沒有，鬼子叫了一声：“什么的干活，通通地捆了的有。”警察就掏出繩索，把我和父亲，还有几个人給上了綁。

第二天，打門头沟送到宛平县，在这里凑齐一百多口子，有个“日本劳工协会”的人，向大家說：“把你們送到北京去当劳工，一天兩頓窩头老咸菜，管你們吃个够。”說完，就两个人一对捆在一起，我和父亲正巧是一对，一根繩拴上父子俩。随后，关进鉄閘子車，車門上了鉄鎖，車內有警察看押。

到了北京，好半天还不見打开車門，等了有一袋烟的工夫，那个“日本劳工协会”的人，又冒出来說在天津下車，大伙心里又气又納悶，只好硬着头皮在火車里，一直悶到塘沽。

下了車，被帶到一座大院里，听人說，这是劳工集中的地方。一进院，就觉得阴气森森，高高的围墙，四周安着几道电网，电网上粘着的血肉，还清清楚楚。有人說：“这哪

是当劳工来了，簡直是上閻王爷这儿挂号来了。”

来到这里，又算是进了牢獄，不管办什么事，先要向日本人报告，他不許可，不能行动，不然就要倒霉。

一天夜里，我要到外边去解手，躺在炕上大喊了一声：“报告，我撒尿。”半天沒有回声，就又报了二次报告，因为急，沒等許可就爬了起来，还没容跳下炕，日本人蹙着眉，瞪着眼，像煞神一样走了过来，哇哇地怪叫一声，一拳朝我打来，我倒在地上，紧接着是一个个的嘴巴，左右开弓，打得我晕头转向，鼻青脸肿，順着嘴角流血。难友們看着，两眼冒火，也不敢吱声，日本人打得精疲力尽，才恶狠狠地說了声：“天亮的干活！”轉身滚开了。大家都气不平地痛罵了日本鬼子一顿。

一連呆了三个星期。一天，两千多人在碼头上聚齐，上了輪船，說是送往日本。我心里琢磨：到了日本还有中国人的日子过嗎？干脆豁着干吧。

在輪船上呆了一个月零两天，每天就給一个茶碗大的小窩头，一口水也不讓喝，日子长了，嘴里干得点把火就能着似的，实在渴得沒轍，就偷着喝海水，又咸又涩，越喝越渴。在輪船上吃喝不多，鞭子、嘴巴挨得不少，連餓带渴，两千多人死去一半多。

到了日本，来到九州熊本县，听說讓我們下井背煤，下井前，先聚在一块受訓，学日本話，練背煤的操作……。

在受訓期間，早上，只給二两飯吃，里面掺着多一半烂白薯。晌午，每人发給一个豆餅面做的吃食，乍一看就像一

块日光皂，大伙一边吃一边嘟囔着：“一顿饭就闹‘一块胰子’吃。”到晚上更惨了，只喝两碗米汤。

受了三个月训，就领我们下井干活，煤矿四周的电网好似蜘蛛网，一道紧贴一道，紧紧层层。下井干活的罪，我十几岁时就尝过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像个鬼。在这里当劳工，太阳不出来就得下井，日头落了才放出来，真是“上工下工，黑咕隆咚。”井下闷得透不过气，一股股血腥味戳鼻子。

在井下干活，脑袋就像掖在裤带上，日本人一不顺心，给你来个“背跨”，就摔个半死。井里的安全没有保障，不知哪时哪刻，塌方、冒顶、瓦斯爆炸，还有日本人的马棒……这条命就得扔到井里。

一次背煤，一脚踩在折断的电线上，只觉浑身一阵发麻，耳朵里“吱”的一响，噗咚一声，栽倒下去，顿时人事不省。后来，才知是穷哥们半天看不到我，四下寻找，才在水沟里发现了我，已经泡了两个多钟头，打捞上来，才算保住了一条命。

在这个活地狱里，干了一年多。外边风声一天比一天紧，防空笛不断地叫，天天钻防空洞，有时在洞里，一呆就是两三天。过了几天不防空了，日本人好像也改了脾气，我们也摸不清是怎么回事，后来，才听说是日本无条件投降了。

日本鬼子完蛋了，大伙议论纷纷，从心眼里高兴。

有的说：“这回中国人可该出出气啦！”

也有的说：“再想骑在中国人脖子上拉屎，那就是耗子舔猫的鼻梁骨——找死。”

还有的說：“日本鬼子捏了咱們一年多，也得讓他小子尝尝中国人的拳头是什么滋味……”

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大伙商量了半天。

第二天，找到日本工头，还没等我們說話，他就像兔子搗蒜一样，又点头又哈腰的好話沒完。大伙气冲冲地說：“別装洋蒜了，你打死了多少中国人，今天还有什么說的！”說完，一拥而上，把这小子揪过来，推过去，像搖煤球一样，然后，按倒在地，拳头、嘴吧揍了一頓。

不多几天，我們就离开日本回国了。

共产党 救活李茂林

回到家乡赵辛店，听說母亲在我們被抓走后，在門头沟受了一个人的騙，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我和父亲就在家里做小买卖、当小工、当吹鼓手过日子。这样，过了三年多。

黑夜再长，也有个天亮。冬天再冷，也会有春暖花开的时候。就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，空中响了一声雷，长辛店解放了。

党和毛主席讓我翻了身，做了国家的主人，我进了长辛店机車車輛工厂，当上了工人。一九五六年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在旧社会二十二年，到处奔波劳累，我得了很厉害的胃病，在連窩头都吃不上的年月里，哪有錢去治病？解放后，有一年我的胃病又犯了，很厉害，党为了救活我这条命，送我

住了半年多医院，花了好几百元钱，治好了这二十多年的老病。

在旧社会二十二年，我们李家门是两代文盲。现在，我的几个孩子都进了学校，读书识字。我也在工厂业余学校里学文化，两眼也不“黑得糊”了。

在旧社会二十二年，我东奔西跑，没个准住处，住窝棚、蹲庙洞……，谁也不知道我的门牌号。现在，我住上了漂亮的工人宿舍，安的是电灯，用的是自来水……。新旧两本账，常常翻翻有好处，想想过去，看看今天。还是拿宿舍来说，现在盖了平房盖高楼，生活一年比一年强，啥时候也不愁吃穿。不忆苦不清楚，一对比差天地。忆苦思甜，没有党和毛主席，就没有我李茂林，是党和毛主席救活了我这条命。

(赵崇佑 整理。毓继明 插图)

悲慘的遭遇

“二七”退休老工人 馬 祥

我今年七十五岁，从十七岁上就来到长辛店，在鐘表舖学徒。当时每月只挣三块钱，实在不够生活，就离开了鐘表舖，托人在工厂里找了个事。我是一九一一年在长辛店铁路工厂上工的，上班后，在机車場給机車修理风汽表，这活我一直干了三十八年。在这些年里，苦辣辛酸我全尝过，我受过比、法帝国主义，軍閥，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欺压和剝削。

为爭人权、爭自由，一九二三年，我参加了党领导的“二七”大罢工。在斗争中，我和工友们一起夺过反动軍閥的枪。万恶的軍閥开枪打死了我們的阶级弟兄，这笔阶级仇恨，是我永生难忘的。

一九三七年，盧沟桥上一声砲响，日本鬼子冲进了中原，鬼子害得我家破人亡，他們逼得我三个女儿当了童养媳，杀死了我的儿子，逼疯了我的老婆，害死了我的孙子，撵走了我的儿媳……，我对旧社会有着刻骨的深仇大恨。

死亡綫上

在日本人統治的時候，我家有十一口人，全靠我一個人養活。當時我掙那倆錢，連袋酸棒子面也買不了，怎么能養活一家人呢？只得讓孩子們到處去拔野菜，拿回家煮煮充飢。由於這種飢寒交迫的生活，加上在工廠受鬼子的打罵，不久，我就得了重病。因為沒錢治，病越鬧越重，以後就拉血不止，夜里一拉就是一盆。就是這樣，每天我也得堅持上班，因為不上班工廠就要開除我。

當時，我家的生活，是少舖無蓋，缺穿沒戴；天天吃的是熬野菜，孩子大人吃得渾身發綠，雙腿發腫。到了寒冬，連野菜也找不着。有時候，為了給孩子們暖暖肚，就燒鍋熱水喝。一次，因為沒煤，連水也燒不熱，我老伴就去煤舖賒煤，煤舖老板一看是我家的人，把白眼珠一翻，鼻子一哼，說：“你還想賒賬，你男人病那麼重，死了誰給錢？”

“我給錢！”

“你給錢？他死了，你一走，我上哪去要？”

我老婆氣得把腳一蹶，回了家。到家把這事給我一說，氣得我半天沒有說出一句話。我想，為什麼鬼子、特務、資本家都跟我們窮人作對呢？我想了好久，後來，我忽然想到“二七”以前，勞動補習學校教員所講的話，這就叫階級壓迫。

兒死在娘肚里

日本鬼子在長辛店橫行霸道、無惡不作，喝得醉醺醺的，

在大街上到处乱串，兽性一发，不管是在大街上，还是在人家里，碰到中国妇女，就要调戏、强奸。被他们糟踏的中国妇女，不知有多少。大家见了鬼子，恨得没有一个不咬牙切齿的。

一天，有个鬼子摇摇晃晃的，嘴里喊着：“花姑娘……”撞到我家来，非要进屋，我和父亲拦住门口不让进。鬼子一看，急了，一个嘴巴把我爹打倒了，随后又把我推开，闯进了屋。我想，这可糟了，老婆和女儿都在屋里，这可怎么办？不行，就跟鬼子拼了。

鬼子进了屋，没看见一个人，原来，就在鬼子进门捣乱的时候，我老婆带着孩子早跳窗户跑了。鬼子进屋什么也没翻着，就骂骂咧咧地走了。

鬼子折腾得这么凶，我心想不行，不能让老婆和女儿在家呆了，得找个保险地，哪儿躲着最保险呢？打听来打听去，打听到靠天主堂那儿有一条地沟，我对我老婆说：“明儿你带着孩子们，到地沟里去。”

那地沟挖得深，里边伸手不见五指，又湿又潮，她们就只好坐在那冰凉潮湿的地下，一天喝一碗凉稀粥。在那儿，一下住了一个多月。当时，我老婆已怀孕三个多月，不用说孕妇，就是好人在里边住一个多月也够餓。由于湿潮冻冷，不得饱暖，我老婆受了风，孩子死在娘肚里。生这个孩子时，差点要了我老婆的命。

三个童养媳

我身体鬧重病，家里也沒得吃，老婆差点丧了命。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呢？一家人天天想出路。一天，有个姓张的到我家来串門，說起張家口那边好。他說，那边好找事，有事就不愁吃，不愁穿。我越听越高兴，心想，真有这样好的地方，就答应說：“去，一定去。”說着，他又給我介紹了投奔的地址。

誰知，这人是个跑合拉纤的，我老婆带着四个女儿，投奔到他介紹的地点后，他逼着我老婆把三个女儿都給人家当童养媳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把我女儿轉卖了，光是二女儿他就得了六十块現大洋。

当时，二女儿才十四岁，給一个姓陈的財主家当童养媳，天天挨打受气。她婆母是个又刁又狠的大烟鬼，每天晚上，讓我二女儿爬在炕沿上，低着头，伺候她抽大烟。她說：“拿水！”二女儿若慢一点，“唾——！”就把痰吐在脸上，接着就是几个嘴巴。水倒多了或少了，也是一頓打罵。由于經常挨打受气，二女儿的身体十分虛弱。有一年，二女儿的脖子上长了个大疮，浓血不住往外流，他們不但不給治，反而嫌她髒，罵她是“髒貨”！

儿子的死

我儿子叫馬永福，二十四岁上，讓日本特务机关給杀害了。

日本鬼子占了长辛店，就把这里的工人当作他们的俘虏和囚犯。一九三八年，鬼子在长辛店建立了洋狗队、警务段、宪兵队三个镇压工人的特务机关。这些机关里，豢养着一大批特务。特务头子是个日本鬼子，叫伊藤，这家伙个头不高，黄瘦脸，一双眼又凶又狠。他受过专门的特务训练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刽子手。他很会说中国话，每天，带领着他手下那帮特务，化上装，活动在工厂周围，或钻进工厂偷偷盯着工人。这帮特务里，有个“中国人”，叫王玉杰，这人中等身材，尖下颏，贼眉鼠眼。在长辛店，提起这个人，没有一人不知，也没有一人不恨的。他原来也是个工人，日本鬼子过来后，收买他当了特务。他仗着日本鬼子的势力，天天提着盒子枪，在工厂到处乱转，瞧谁不顺眼，就带走。

一天，我儿子正在他姑姑家呆着，忽然跑进个工友，着急地说：“永福，不好！快跑！王玉杰带人抓你……”话没说完，特务踹开门，闯进了屋。王玉杰用手枪逼着我儿子说：“马永福，你让我好找！你往哪跑？带走！”特务们一齐下手，把我儿五花大绑，带走了。

当时，我正在家，忽然，姪子马庆忠跑进我屋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大叔，不好……特务王玉杰把我大哥逮走了！”我一听，吃了一惊。我老婆也急忙从炕上跳下来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姪儿说：“不知道。”我老婆问：“带到哪儿去了？”姪儿也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我一听不知下落，撒腿就往外跑，逢人就问，见人就打听，可是谁都不知道。后来才听说，把他押到警务段去了。

儿子到了警务段，王玉杰先把他狠狠打了一顿，接着就问他：“馬永福，你該我的錢，为什么不給？”

我儿一看，問話的不是別人，正是特务王玉杰，就說：“我不知道該你什么錢？”

王玉杰恶狠狠地說：“好——！你敢嘴硬，給他上刑！”話沒落音，几个特务就把他按在电椅上。过电以后，又說：“你把我的錢拿到哪儿去了？你敢私通八路！給我打！”

我儿子在警务段整整押了十天，天天过堂，天天受刑，压杠子、灌辣椒水，最慘的是在他肚臍眼上点腊，弄得死去活来，最后拉到永乐河边杀害了。

家 破 人 亡

儿子被杀害了。这真是晴天一声雷，我和我老婆伤心极了。可是又不敢給儿媳說，因为她就要生孩子了，給她說了，怕鬧出事来。

可是紙里包不住火，儿媳生孩子后，見自己丈夫几天几夜沒回家，又看我們老两口表情不对，就問：“媽，永福回来过沒有？”

我老婆說：“你好好养着吧，甭掛記他了。”

儿媳說：“媽，永福出什么事啦？”

我老婆說：“他……他……”再也說不下去了。儿媳知道不好，一头扎在婆婆怀里哭起来。

从此，儿媳再也不顾自己的身体和孩子，天天跑到野地去哭。三天上，小孙子也死了。

我老婆一直哭了七天七夜，不吃不睡，每天只是想儿子、哭儿子。七天后，她不再哭了，跑到大街上乱嚷乱骂，叫儿子，骂害儿子的敌人。再以后，就披头散发，乱说乱道了，衣裳撕了，鞋袜也丢了。人们都说：“可怜的老太太，哭儿子哭疯了。”

她是疯了，是旧社会逼疯的，逼得她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啊！

儿子死了，孙子死了，老婆疯了，儿媳留不住了，四个多月后，她改嫁了。

来了救星共产党

解放了，压在头上的大山推翻了，受压迫、受剥削的日子，再也不回来了。接着，工厂里开始了民主说理斗争，在控诉王玉杰的大会上，人们叫我老婆上台去控诉，她走上台，只是哭，说不上来。有人说：“老太太，有话你就说吧，有毛主席给你作主。”我老婆擦了擦眼泪，用手一指王玉杰，厉声地说：“活阎王，你也有今天！我问你，我儿子马永福是你杀死的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我儿媳是你逼走的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我是你逼疯的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这活阎王，你这杀人不眨眼的大坏蛋！我要求政府

給我报仇！”我老婆越說越气憤，真恨不得过去咬他几口。

这时，群众震天动地地喊口号：“枪毙了这个大坏蛋！”“枪毙活閻王！”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下，人民政府根据法令，把他枪决了，替工人們报了仇、雪了恨！

旧社会把人变成鬼，新社会把鬼变成人。解放以后，我老婆的疯病好了。她現在六十七岁了，还經常帮政府做些事。她說：“不为国家干点什么，心里总也过意不去。”

我从一九五四年就退休了，家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生活很幸福。我是个修表工人，喜爱座鐘、掛表，可是在旧社会我沒有一块，現在我家有了鐘表，当鐘表叮噹响时，心里就有說不出的快活。家里还有收音机，每天都听国家大事，每当听到我們社会主义建設取得胜利时，心里就高兴。有时，我也到工厂里去轉轉，看到厂里的飞跃发展，看到青年們的进步，更是高兴。解放后，高兴的事儿多着哩！数也数不清，說也說不完。

（申跃增 整理）

后 记

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，我厂一些老工人通过回忆对比，編写了这一本血泪斑斑的家史。

为什么要編写家史呢？

一方面是因为我們国家解放后，不少青年人“甜里生、甜里长”，就像有的老工人說的“是吃蜂蜜长大的”，是个“和平鴿”，不懂得什么是階級压迫、階級斗争。有些青年，甚至连旧社会的一般情况也不了解。在运动中，一个老工人，提到几十年前，父亲从山东老家，推着小車来长辛店铁路工厂上工的悲惨情形。一个和他同乡又在一起干活的青年人，惊讶地說：“你們为什么不坐火車来呢？”听到老工人受压迫的痛苦经历后，那个年青人气憤不平地說：“那你为什么不提意見呢？”从这些情况看，由于他們沒有亲身经历过旧社会的黑暗生活，因此对旧社会就認識不足。这样，就容易受到資产階級思想的侵蝕，不利于树立无产階級思想和階級斗争的观念。而一些家庭出身好的子弟，有的認為自己家庭好，是“自来紅”，没有什么問題，忽略了自己的思想改造，也容易失去警惕，沾染上一些坏东西。正像一个老工人說的：“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，脑袋上沒有貼着标签，資

产阶级思想照样会钻进去。”这是一个严重的值得注意的问题。

另外一方面,就是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,由于解放后生活一天比一天好,有的人渐渐忘了过去的阶级仇恨和苦难生活,满足于当前的安逸生活,思想渐渐“长了毛”、“褪了色”,有的甚至忘了本。这种现象虽然是少数的、个别的,但是也值得我们注意。

由于以上这些原因,资产阶级思想就容易从四面八方来侵蚀我们的队伍,腐蚀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灵魂,使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遭到损害和破坏。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产生,即使产生了也便于克服和纠正;为了使得广大青年更好地知道过去,更深地热爱新社会;为了使得更多的成年人、老年人不要忘记过去,更好地建设新社会,所以我们决定编辑这一本家史。就像书中一位老工人说的:“新旧两本账,常常翻翻有好处。”这对教育我们老的一代和培养新的一代是有好处的。

由于水平的限制,书中难免还有缺点和不够的地方,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帮助和指正。

中共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委员会

1964年3月20日